

# 清議

第 二 卷 第 一 期

社 論

用新人，行新政！

專 論

試論我國經濟問題中的心理因素

為中國土地問題試探一條根本出路

談耕者有其田

論充實發行準備

美國經濟恐慌與世界經濟

鴉片戰爭中的林則徐

介紹工業經濟的一個新動向

編後



王士奇

李鵬天

喬沅譯

彭慶笙

老兵譯

三十七年五月十五日  
清議月刊社出版

上海廣元路雲裳村二號  
南京太平路建福里八號

鐵 胡 輝 編 輯 方 張 人 行 發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信託外匯倉庫

總行及滬行 上海寧波路五〇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  
南京西路 愚園路 林森中路 八仙橋 提籃橋  
虹口 徐家匯

外埠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雞 長沙  
南昌 漢口 武昌 蕪湖 南京 鎮江 無錫 蘇州  
常州 香港 廣州 北平 天津 青島 濟南 蚌埠

# 中國旅行社

電話：一三四五〇號轉接各組  
地址：四川中路四二一〇號

## 本社業務一覽

承辦國內外貨運行李業務，代客報關，代理保險等。  
發售國內鐵路客票，預定車位、鋪位。  
發售國內機票船票，預定機位船位。  
發售國外及香港輪船、飛機客票，辦理國外聯運，預定  
座位，代擬行程，代客申請外匯，領售銀行旅行支票  
等。  
代理郵電業務，經售旅行雜誌及刊物，代售印花、郵票  
等。

請訂閱

全國唯一金融經濟專門性日報

# 金融日報

金融消息迅速正確  
經濟新聞特別詳細  
每日清晨專車遞送  
工商各界不可不看

## 主要内容

上海金 融市場	上海商 品市場	上海對 外貿易	上海工 業新聞
每日根據地詳情，華股外 股公債市況，外匯及內匯市 場動態，國家銀行及商業行 莊業務，報導最詳細，數字 最可據。	分食物，燃料，衣着，建築 材料，日用品，出口品，化 學品，文化品等八大類，行 情最正確，敘述最清楚。	進出口管制法令，出口物資 產銷情形，進口貨物運銷情 形，英美及香港市場介紹， 內容豐富，不厭求詳。	全國工業協會函電公告，上 海工業協會函電公告，各廠 商設備及出品介紹，工業消 息，搜羅最翔盡。

電話：一四三〇五  
電話：二一七五〇

社址：上海九江路一〇五號  
發行所：上海九江路三三號

# 社 論

## 用新人，行新政！

行憲伊始，一般人對於行憲政府的期望甚殷。一般人心裏悶，需要變！過去的政府和政府的措施，都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現在是訓政結束，憲政開始的時候，正應一新天下耳目，與民更始。

我們覺得第一樁事應該做的，是用新人。過去的政府，太不能令人滿意了。無能、貪污、顛預、敷衍、官僚作風、衙門習氣，幾乎是中外一致的批評。這樣的一個政府，當然不能做事，負艱鉅。時代的輪子只往前進，過去的在位者，儘管在過去是一時之選，在現在已不合要求，現在政府所需要的，不是資望、門閥、功勳而是有作為、有魄力、有抱負、有朝氣的人。只有起用這類人，才能掃除過去的官僚作風、敷衍主義，一切的事情才能有起色。若不然，仍舊像打馬將牌一樣，換換位置，依然是一般老腳色，表面上政府改組了，骨子裡換湯不換藥，這樣的政府一定會走頭無路的。

所以行憲政府的第一件事。是用新人。能用新人才能行新政。這是有連帶關係的。

所謂行新政，先得有一個前提，即法治和民主。今後的行政機構是執法總機關，但也是提議立法案的機關，再加上「臨時條款」，這其間如果不妥慎運用，很可能和以前的政府沒有甚麼兩樣。我們要行憲，要從紛亂中求安定，第一個原則便是不能違背行憲的基本精神，甚麼是立憲的基本精神？在目前的中國，就需要負責行政的領袖能有民主的風度，不以一己之觀念為主，尊重大家的意見，有涵養，能容忍，不能儘求「統一」和「爽快」，要知道行憲就是在紛歧中求一致，在辨難中求決策的，沒有這種認識，休想行憲，也不會有憲政。我們很重視在上領袖人物們的先從心靈底蘊處改變以前的意識型態，能如此，政府才會變新，才能行新政。

行新政的第二要義就是切切實實的實行民生主義。民生主義我們覺得確是救中國的良藥，過去由於政府的無能，一直未能推行，以致搞的民不聊生。今後我們應該拿出魄力來，拿出辦法來，切切實實的來推行。一件事情除非不舉辦，如決定辦，一定要澈底辦，辦到底，遇到任何阻礙必須加以克服，不畏難，不氣餒，如此，才能像一個想做事的樣子；如此，一件事才能有做成的希望。話說回來，要行新政，第一還是要用新人，祇有起用一般有魄力、有抱負、有辦法的新人，才能一掃過去顛預、敷衍的作風，官僚、衙門的習氣，才能做事，才能一新天下耳目。



# 專論

## 試論我國經濟問題中的心理因素

楊桂和

### 一、引言

時賢對於我國經濟問題的討論，不能說是太少，對於政策的建議與批評，也是應有盡有，然而，議來議去結果似乎大家都感覺到「出路甚少」，比方說，關於物價問題就有許多人認為談不出一個究竟的。

這種情形似乎正在擴大，被一般所稱讚的若干政策和辦法，結果竟是失敗和行不通，若干在國外所能推行順利的方法搬到中國來扮演，就會愈來愈不像樣，結果成了一種名詞，對事實不能有所改善。其中原因究竟何在呢？

我個人覺得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們把人的因素這一項太低估了，我不是說大家不注意人的因素。許多學者都認識人的因素在我們經濟問題中的地位，但是我覺得光是承認還不够，目下中國經濟之苦惱和無出路，最主要的還是受制於心理的毒素，這並不是我故意誇大其詞，而的確是我們應該重視的一個領域！

### 二、決策者與經濟問題

與經濟問題有關的階層可以分為下列四種：

- (甲) 政策決定者
- (乙) 政策執行者
- (丙) 政策有關者
- (丁) 輿論界

我們都知道第一次大戰以後，世界經濟思潮有了很大的改變，其中最重要的無過於對「人為力量」的崇拜。在一九二〇年左右各國對於物價外匯等等還是聽任自然，可是自從一九三一年德國沙赫志(Dr. Schacht)的新金融政策實行以後，局面就大大的不同。德國為維持馬克匯率，不能不全面管制進出口，但為有效達成此目的，又不能不全面控制生產界。從德

國的經驗得到，只要能控制對於外匯的需要量，就可以維持匯率於永久，希志拉把這項原則應用到所有經濟市場上去，形成了所謂「集權經濟」體系，就是把全國各種生產力量都加以組織，有類於作戰的軍隊，無論物價、生產及消費都是決定於希志拉的意智和觀念，所謂「人定勝天」，在納粹德國是辦的相當成功的。

由於德國這種計劃經濟的成功，使得不少國家紛起仿效。各別國家所取的方式容有不同，但其基本出發點則是一致的，即是不願再把一國的經濟致諸「自然」之手，而是或多或少在使用著「人為」方法的。這種思潮對於經濟有困難的國家特別有吸引力，除去少數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以外，差不多都被這種思潮所感染。我們中國也並不例外。

中國之講求計劃，那是從抗戰以後才比較具體的，雖然在民國廿五六年國內已經有不少人在介紹和討論「計劃經濟」這個問題，政府也有五年

計劃之類的设计，但是真正見諸事實還是要從抗戰以後才開始。儘管抗戰時期有許多阻挫這種計劃經濟的進行，但是骨子裏我們還是要走上這一途的，旁的且不講，只要看中央設計局的許多嚴峻計劃，就可以領悟一點在我們政策決定者頭腦中所想像的一些境界了。

採行計劃經濟本來是一種時代風尚，不足為怪，但是它的基本條件則為我國所缺乏的。計劃經濟的基本條件是甚麼？簡單說來有四：（一）統一而獨立的政權，（二）組織發達的社會，（三）強而有效率的指揮幹部，（四）適合本國社會的一套經濟政策。關於這四項我國都是不够標準的，我想也用不到再多作解釋。然而，問題就出在這裏！

任何在上者雖然未必自以為絕對「聖明」，但至少覺得是高人一等的，而更因為責任感以及威名感的催促，往往會使得一種常人所無的「望治心切」心理經常出現，這種心裏如果逢當國泰民安的時候倒並無所謂，但是如果生不逢辰，就會使得一個人心理反常。急燥的內心不僅可以失去權衡事態的功能，而且會感到僚屬的能力不够，不能不事事躬親的。

中國的計劃經濟自從勝利以後，多少是受到國際上的阻力的。特別是當我們黃金外匯花得差不多的時候，更有這種感覺。三十六年出口津貼辦法的撤銷，就可以象徵一二。美國是我們最大的靠山，但是美國所推行的老牌自由經濟，雖然在過渡期間我們還不致受約束，但是「自由」「開放」這種壓力依然是存在的。上面我已經說過我們接受計劃經濟思潮的過程，並且我說過這種思潮對於一個經濟多難的國家最有吸引力。自從勝利以後，我們許多的計劃都粉碎了，情況一天不如一天，客觀環境雖使我們很容易步法德國，但是我們經過八年抗戰以後，對於那四項基本條件更顯得較前缺乏。看遠景，全盤的計劃經濟又有孤立的危機。這就構成了一種煩惱，這種煩惱使我們政策決定者心理上不免變態，從而影響了中國經濟制度這個大問題。中國到底是甚麼經濟制度？有人說是民生主義，但是仔細檢討一下，並不如此，資本主義嗎？也不是。社會主義嗎？也不是。集權主義嗎？也不大像。如果我們自己有胸襟，我想應該坦白的承認是一個「四不像」的經濟制度，一會而講自由，一會而講統制，有些地方統制得超過計劃經濟的領域，但是有些地方則自由得連資本主義國家也比不上！

### 三、執行官吏的狹路

在真正計劃經濟的國家，它會產生一批新型人物，這種人物對政策的執行並不是權衡利害和損益的，他們是像軍隊上的大兵一樣的奉令辦理，腦筋裏並不用轉應該與否，因為這有決策機構來負責的。因其如此，所以每一種政策決定以後，其執行是非常澈底而迅速的。實際上計劃經濟的成功，很靠執行的迅速與澈底的。

我們政府中負責執行的官員們，雖然有不少是受過訓練的，但是卻並沒有多少像上面所說的那種新型人物，其中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在我們政治制度裏面沒有能建立「分層負責」這種精神。這一方面由於一切經濟計劃都不够精密，責任沒有方法可以分清，（這當然與中國社會組織散漫有關），因此可以互相推諉，另一方面是黨的組織工作不够，不能真正考核是非，這樣使真正努力推行政策者勞而無功，虛應故事者並無處罰，而且因為他會作表面文章，反易邀寵。

尤當通貨膨脹日趨嚴重的時期，執行政策者不能不想法在執行上取巧，大官想發大財，小吏想發小財，人人為自己安全作打算，政策如何能够澈底而迅速的施行呢？表面上是奉公守法，為國宣勞，但是暗底裏則作那些「拾包袱」，「黑吃黑」等等勾當。

誠然，也有若干公正廉明的執行官吏，不愛財，想辦事。但是如果他「鐵面無私」的辦事，又發生幾種困難：（一）他沒有上方寶劍，各方面的牽制會層出不窮，（二）他沒有與他抱同樣信念的十字軍，如果他永遠如此作風，管保他手下的人手逐漸星散，（三）獨木難支大廈，硬撐的結果，不出糾紛還好，否則就有免職丟官的危險。所以在這種大環境下，最好的執行官吏也只能抱「但求無過」的態度，而想「趁火打劫」的心理，更不在少數。一種政策執行起來走了樣以及無效果，還能說是偶然嗎？

### 四、工商界的阻力與大眾的抬頭

與政策有關者就是受到政策影響的人們。這種人的心理很簡單，即是趨利避害。一種政策對他有利益，他歡迎，一種政策對他有損，他反對。這本是人類的普通心理。但是在一個預備走上計劃經濟的國家，就不能允許

這種心理太發展。因為任何一種計劃雖然最後可以對全社會有利的，但是在施行的時候，一定不能面面俱到，特別是集權經濟制度，因為計劃進展階段的不同，對於某一階層有所壓抑，減少其利益，是常有的事。但誰能因為反對而就牽就，結果弄得計劃破碎，一無是處。

中國政府從抗戰以來所行的經濟政策，可以說千篇一律的是找弱者開刀。最大的弱者是農民，農民是被視為百分之百的良好開刀對象。他們不會反抗，不敢反抗，也沒有人替他們說話。苛捐雜稅且不用提，正稅除去徵糧借糧而外，就是貨物加稅。按能力出稅這項原則早就停止了，請看今日稅收以貨物稅居首位，就可明瞭。直接稅所遭遇的阻力，是與日俱增，但政府對之也無可如何。

農民以及一般薪給階級，近來對於政策的抵抗，也比以前積極了。在農民方面為保障不受通貨貶值的損失，已經公開的使用了銀幣，這在華中和湖南江西都是很普遍的事實，這就是人民不承認法幣，不信任政府心理加深的表現。至於一般薪給階級也不像抗戰時期那樣忍受。首先表示反抗的是工人階級，自勝利以後工人即不願接受法幣貶值的損失，而要求按生活費指數發薪，這項要求是成功的。其次是大學學生，他們對於戰時所享受的公費辦法，不能放棄，政府也無可如何。最無反抗的當然要算政府機構中的公務人員，他們受着通貨膨脹無情的剝削，欲抗乏力。不過，自從去年以來，反抗與不滿的表現也是與日俱增的，若干事業機關也有罷工等行動。弄到今年也不能不實行指數發薪辦法。但是，這般人在心理上是與政府沒有多大情感的，因為經過抗戰八年的共患難，結果事實證明了政府並沒有把他們看成伙伴，更談不上是同志了。所以甚麼政策云云，與他們是風馬牛不相關的。因為在情感上是解體了的，執行政策頂多不過是抱着：「等因奉此」的心裏。請想，那裏還談得上行政效率？比起集權國家的行政幹部，差別何啻天壤？

還有一項新的因素，就是所謂「民主」思想的傳播。在君主時代或是訓政時期，政府政策可以根本不必考慮社會的反響，社會上受到政策影響的人因為地位的關係，也不存其他念頭，只有自認不幸。在這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時代，政府對付一般人（即受到政策影響者）的辦法，比較簡單。但是，自從我們也在提倡民主的風氣中，就發生了一種不利

於政策推行的心理，那就是一般人心目中都多少存着「平等」和「自由」的觀念。這種觀念一經形成，則許多過去可以推行無阻的辦法都要重新受到考驗。對於稅收，工商界可以表示意見，對於外匯，出進口商也有自我的主張，再加上各省市的參議會，對於若干政策都可以毫不負責的指摘與主張，因為參議會是代表各地工商業利益的。不過，政府的若干政策的推行，特別是在裁亂的時候，總是要減少社會上的利益以增加國庫的利益，如果工商業都不肯自我犧牲的心理，難道要政府取給於真空嗎？

政府對於工商業是有些顧忌的，因為他們能够反抗，也懂得聯合抵制。事實上自從抗戰以來，與其說政府剝削了工商業，還不如說政府滋養了工商業比較恰當。我們政府對於物價的管制，並沒有產生類似歐洲的現象，因為我們沒有實行所謂「經濟馬爾薩斯主義」(Economic Malthusianism)換言之，即沒有真正能管制住大企業，大企業在中國仍然是利益很厚的，比起歐美來，頗為不同。這也是中國何以不能管制物價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政府在事實上是對大企業低頭的，所推行的政策也受這般人的左右，假定要推行一種政策而為利益集團所反對時，負責執行者就成了一個最難扮演的角色了。

政府在過去是可以把一切損失加在無告的老百姓身上的，但是近年來這種局面已漸漸不同，上面我已經說過一些關於農民拒用法幣和薪給階層的反通貨貶值運動，但此外還有一種更重要的底流，就是大眾地位的抬頭。社會主義雖然在中國還不能實行，但是勞苦階級的地位已經大大的不同於既往。事實逼着鄉村要走上土地改革的途徑，雖然方式可以不同，但是最受人爭取的自然還是貧農。地主階級雖然還想掙扎，但其地位之日趨衰落，恐怕是一個無可挽回的趨勢。

中國日漸貧富懸殊了，極富與極貧的結果，勞苦的大眾遂成爲一種不可掩蓋的危脅力量。因為沒有中產階層的力量，社會一天一天的失去了穩定性，惟一維持秩序的力量只有依靠武力了，但當勞苦階級人數越積越多的時候，這種維持的力量也就感來越成問題了。在這種大勢下，除去少數頑固派外，多數的富貴階級以及政府官吏對於勞苦大眾的心理，其看法也與前不同了。

勞苦大眾的心裏，最主要的是要求物價低廉，凡是有刺激物價的政策，

大眾總是反對的，怒恨的。大眾心理是衝動的，單簡的，何況是受了十年戰亂與高物價剝削的羣衆，其妬恨刺激物價的心理，是不可形容的。然而現政府既不敢得罪工商界，又要取悅於工人階層，其政策無法不是取給於大眾，但大眾心理是那裏的一種潛伏的可怖的浪潮，很有影響於政策的推行徹底。這也就是何以我們的政策沒有一個可以收到效果，而必需間歇式的加以調整改革了。

### 五、輿論的不夠強大

最後，我想對於輿論界說幾句話。中國輿論界的脆弱是用不到多說的，其所能發生的影響，也是有限度的。這其中的原因有四：(1)社會文化水準太低，輿論界所能行銷的領域有限，(2)文化事業缺乏經濟基礎，其言論有時不能秉公直書，(3)黨化新聞界的結果，輿論不過是一種粉飾品，(4)利益集團的代表意見，其出發點是替主人講話。

特別在通貨膨脹的局面下，新聞界因爲經費上的艱困，更不容易堅持操守，尤其當一般社會低視文化的時候，自然不容易培養健全的輿論了。分析目下的輿論，大致以抱「落井下石」的態度較多，這可以部分的滿足大眾的心理。次之即爲撻場面湊熱鬧，人云亦云一番。更次的則是故意造謠立異，以求銷售。目下除去少數大報的社論還能維持相當系統觀點以外，諸多報紙社論不過是東拉西湊的文章，報館本身並不一定熱愛它的主張，就是寫文章的人也不知道究竟何去何從。凡是熟悉各報的人，都可以瞭解這種情形。

像這樣的情形下，自然很難希望有正確的輿論。再加上各地方對於新聞記者的敵視，當局對於言論的限制等等，因此我們當前的輿論界對於許多問題，都不能澈底的探討，雖有一些人看到這點，也僅能作騰雲駕霧的說法，誰又能單刀直入的指陳是非呢？所以輿論界的領域遂愈趨愈狹。嚴正的態度既日趨微末，只有向諷刺，漫罵，造謠等方面去發展。既不敢仗義，也不肯負責任，每天攪來攪去，只不過表示些若隱若現的看法，對於每一問題的根柢，誰都不願觸及，只不過枝枝節節的浮說一陣，就算了事。

輿論界的空虛不僅是其本身的缺欠，而且有關經濟政策。因爲任何一

種政策的推行徹底，雖然是行政效率的問題，但是如果沒有強有力的輿論在那裏監督和支持，也會少去許多艱困的，不幸，我們輿論界還不够強大，對於政策還缺少支持或是阻止的力量！

### 六、結 語

以上略略把心理因素對於當前我國經濟問題的影響談了一下，有許多地方缺欠說明，而且有許多地方沒有談到，我希望本篇僅僅作爲拋磚引玉的工作，即是喚起我們大家多從這個角度上去探討經濟問題，如果大家能够把許多心理因素發掘出來，也許對於若干經濟問題的置議，可以更進一步的接近底蘊。

(上接第十一頁)土地問題在我國可以說是一個歷史發展問題，每一個朝代都想解決它，結果呢每一個朝代却都被它解決了，這個癥結是什麼？第一、經濟的原因，人口增加土地不足分配，因之分給制度不到卅年四十年無法繼續，第二、政治的原因，分給制度與戶口情形有密切關係，如戶口不準確則不但無法授田，且亦無法徵稅，占田制度立定不久，國內不清，均田制度到北周賦斂無定則，人民相率逃徙，班田制度推行未幾，安史亂起，均田制度到北周賦斂無定則，使分田制度無所依藉而告終止的。第三、社會的原因，大地主勢力之根深蒂固，自商鞅變法爲田開阡陌以後，土地集中於豪門，地主的勢力日漸鞏固和擴張，分田制度欲摧毀此既得利益，然結果常常敵不過地主階層的力量而破壞無遺。

那麼，實現土地國有制度是不是爲不可能的事呢？

古授田與還田制度的井田占田班田和均田誠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主張由混合土地制度的推進，從集體農場去實現土地國有，一種漸進的國有政策，它具備了分田制度所未具備的諸條件。

新農業階梯推進到集體農場以後，雖然在公共耕作土地中尚分出一部份給予集體農家庭，供其個人使用如園圃之類，作爲私產，然此私產的範圍却已在減縮中，換言之，共同生產與共同生活範圍已逐漸擴大，漫地要取消了這私人經濟的徵絲，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則達到這種情形後，土地或爲農場所有，或爲國家所有，本質上根本是沒有什麼差異的。因

(下接第二十頁)



# 為中國土地問題試探一條根本出路

曹平遠

## 一、混合土地制度改革之理論基礎

中國封建半封建性的農業制度，由於土地所有和使用之矛盾的發展，演成一個農業的社會問題和一個農業的技術問題，前者主要的是土地所有權的急劇集中和租佃關係的惡化，後者為細小經營底生產落後技術停頓之匱乏經濟的加深。中國農業農民和農村三者構成社會結構之基本，農村經濟問題故是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最基本的紐結，土地所有制度却阻礙着國民經濟的向上發展，超經濟榨取的租佃制度斷裂了國民經濟生機的發榮，小農經營制度又構成國民經濟落後貧困和破產的基礎，這個紐結並且是愈結愈緊。

一般的說，工業化是解開這個紐結的惟一辦法，使中國從貧弱的境界裏掙扎出來，可是它的發展呢？却要依藉進步的技術和大量的資本二個重要因素的健全，沒有進步的技術，雖然積聚了大量的資本不易使生產進步，沒有大量的資本，雖然有進步的技術也一樣不易工業化。可是農業國家其資本大部份固定在土地上變成死資本(Dead Capital)，應用大量的勞工和牲畜又致技術停頓，所以農業這一生產事業，要却為一種初級的經濟活動，其使用的資本既較小，生產力又較弱。

克拉克(Colin Clark)曾把所有的經濟活動

，分為初級的，次級的，和第三級的三個範疇，第三級生產事業的繁榮(即社會生產工業化)依賴於初級和次級的生產事業之相當成熟的發展，因為它們是實現工業化的大前提——供給大量的資本勞力和廣大購買力之市場。因此，封建的農村經濟之改造成為工業化建設的始基，這種改造，在英美是資本主義農業制度的表現，蘇聯是社會主義農業制度的建立。

中國呢，實現耕者有其田是這個改造運動的開始，然而耕者有其田後又怎樣呢？依然建立在二個基礎的農業制度上，一個匱乏經濟的舊局面。因為最明顯的，即使我們徹底的實行耕者有其田，全國每一農民平均還祇能獲得四、三市畝耕地，這欲達到農民不飢不寒的小康水準或者可能，要中國基於這個小康水準上供應一個有大量資本蓄積，大量勞動力剩餘，和為購買力極強的市場(農村)，却萬萬困難，因它的小農個體經濟之技術停頓與匱乏經濟之惡性循環的本質，並未稍有改變。反之，資本主義的農業制度或社會主義的農業制度中其情形完全不同。經營型態都採取大規模的生產形式，農業商品化機械化的。故如美國，每個農家通常因此常有二十五匹馬力的機械工參與，每匹馬力要相當於八個壯丁的動力，即等於我們每個農家通常要僱二百個雇農在勞作，還不管白日之夢了。

那麼因此謂我們步英美的後塵實行資本主義的農業制度嗎？那却又重現剝削的租佃關係，多數的農業勞動者，仍處於不利地位出賣勞力換取工資以過生活，任農業企業家榨取其剩餘的勞動生產。取蘇聯社會主義農業制度的模範呢？一、蘇聯是實行土地國有的國家，農民祇有土地使用權無私有權，不能自由轉移和出租，故其推行集體農場的困難也較少，二、中國當前的經濟條件下，大農制度的建立又尚非簡單的擴張耕地面積所能達成。

則如要使中國農民獲得幸福和中國的農業工業化，原則上我們因須將小農各自的土地集中起來，運用最好的生產工具和機械插種施肥收割像英美或蘇聯一樣，但是上述二條路事實上又行不通，這二條路之外，則我們須要找第三條路來走。

筆者主張這第三條路是混合土地制度，擷取資本主義農業制度和社會主義農業制度的優點混合而成的一條第三種國家的出路，從改變土地使用的私有性質上入手，而逐漸使土地所有形態發生變化。

質言之，我們試從聯合自耕農場(土地共耕合作)而集團自耕農場(土地為自耕農團所有，共同生產個別消費)而到集體農場(土地國有場用，共同生產共同消費)之大農制度的改革，三者間是因集體化社會化之程度的不同而發生差異



，然形成一個連續性的階梯，這階梯筆者稱它為新農業階梯(New Agricultural Ladder)，強化聯合農制可進於集團農制，由集團農制而完成集體農制。所以實行混合土地制度的改革，可以一、擴張耕地面積，二、經濟土地利用，三、提高生產能力，四、改進農民生活，五、逐漸完成農業工業化。

混合土地制度的精神，因此我們可以說是基於利益主義自願主義和緩進主義的。質言之，提高生產力增加生產量是混合土地制度之改革的利益，基於這個制度的利益，農民生活因之改善而才易被廣大農民所樂於接受，成為自願的性質。因為假如廣大的勞動力束縛在封建的土地關係上與落後的小農經營形態裏，不論其為租佃形式或自耕農形式，永遠是擴張耕地面積經濟土地利用和提高生產能力的死敵。

許多激進的經濟學者，因之有主張中國土地問題的改革要推行蘇聯式的集體農場制度，以期迅速完成農業工作化，而反對含有封建性的耕者有其田，其祇能適合小農制度而實為生產力的掣肘，構成國民經濟向上發展的障礙的。可是我們不能同意這種偏激的論見，第一、目前中國的經濟情形並不適宜立即實現蘇聯集體農制已如上面所指陳，第二、沒有經過耕者有其田的過程，直接實現集體農場制度可能變質為資本主義的集團農場。所以混合土地制度的第三個屬性是漸進主義。

資本主義集團農場的農業企業家是以獲取利潤為目的，而農業生產却以季節性的限制，多僱傭常年勞動甚不經濟，於是他們祇在農忙的季節

臨時僱用季節勞動者短工，以節省開支。然而季節勞動者呢，却不能依藉幾個月的工作勞動維持一家甚至個人的生計，必須兼為小農經營，因此集團農場資本主為了適應這個環境，備備大批臨時僱傭勞動起見，不得不在租其一部份土地給季節勞動者耕種。這樣，一面製造了半獨立的小農經營，一面又使大農場的本身建立在封建剝削的關係上，則中國的這種資本主義集團農場，必有一日發生於剝削關係之經營基礎的動搖而來的生產技術停頓，而顯見了生產技術的限制性。

實行具有利益主義自願主義和緩進主義三屬性的混合土地制度因之不同，它可以達成社會主義集體農場的實現，這是中國工業化的大前提，也即是中國貧困的農民生活上一個真正的變革。

## 二、混合土地制度底實際

### (一) 混合土地制度之經濟性能

耕者有其田的地權形態不能通用大農經營方式，因其耕作費用常與家計費用相混，施耕的順序又時以耕作者自己主觀的意識為標準，並且耕者自有其田的實現，又常使田面的細分，故要言之，土地農有一方面因分配於各農民之私有耕地面積有限，各農戶又多係分別的獨立經營，所以常不易聯合成大農場，因此，大規模的農業機械與其他各種科學方面無法採用，二方面，因集得耕種固能增加，總以收穫却未必能增加純收益，而其生產費用又較大，因之耕作者如資力有限，且圖近利祇注意於純收益的增加，則集得耕種仍致不易發展。據卜凱教授調查研究之結論，故認

為中國小農經營型態其弊害百生，為反農業經營原理的，(1)在小農經營中農民勞力之耗費較大農經營為大，換言之，農民勞動的效力在小農經營中沒有大農經營中之高，(2)在小農經營中畜力的應用也和分工一樣之浪費，甚至往往為了農場過小，不但不能應用機械而畜力也不能應用，(3)小農經營排斥農具之合理的應用，農場愈小，農具費用愈大，而效率却愈低，(4)小農經營對於建築方面的耗費，也較大農經營為大，(5)小農經營對於工資的耗費，也較大農經營為多，(6)小農經營減少農民的報酬，農場愈小勞動的收益也愈少，(7)農場支出與收入相抵的餘潤，小農經營所得也較大農經營為少(註一)。所以，小農經營任其如何改進，還根本擺脫不了貧困之包圍。

混合土地制度呢？矯正了這種弊害，而強化農地的利用促進農業之生產：第一、混合土地制度農場是由土地的聯合共耕開始，所以形式上其為大農經營制度，(1)地形整齊，耕地面積損耗較小，(2)改善農家和農田的距離，(3)可以用小經營所未能應用之機械，(4)可以設置灌溉與排水工程，(5)可以實行分業，(6)可以實行科學的管理方法。有人說二十世紀的農業文明建立在進步的機械生產之上，則混合土地制度的農場經營形式實為實現區農業文明的坦途。第二、混合土地制度農場乃由土地的耕者自有開始，所以沒有資本主義大農場的獨占形態，形成農業中勞資對立的情形，又沒有共產主義大農場之共同生產，各取所需之引起怠耕的可能，這二者都是農業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然而混合土地制度農場中

耕作既非為債權者勞動，亦非為地主或借地農業者勞作，可以保持勞動者的「勞動狂」，促進農業的生產力與生產量。

因之，混合土地制度是一種協作的公共的集體的勞動組合的土地耕作制度，引導個體經濟漸進底入於集體的經濟範疇。

### (二)組織，管理和收入之分配

混合土地制度農場由於經濟聯合之範圍的不同，集體化與社會化之程度的差異，聯合農場成爲其初級的形式，集團農場是其次級的型態，集體農場始爲其第三級的形式最高的型態，不過三級間有二個共通點存在：一、外表上農民的生產手段和勞動力都聯合在一起，實行土地合併廢除畝畝經界而合併耕作的，二、在經濟聯合的範圍內，不生產者不得食，所以於此剝削人的關係固已消滅，有欲依賴他人的勞作坐享成果的情形也不允許存在。這是混合土地制度農場的二個基本原則。

然而，混合土地制度怎樣從理論配合到實際呢？這是這裏我們所要討論的。

#### 一、組織問題

浸潤於現實主義的農民，土地私有制度存在一日是一日奴隸般忠順於土地的，因此從耕者自有其田過渡到混合土地制度，初期我們就不能操之過急，蘇聯農業勞動組合是依據於土地之已經國有化之一基礎上，始逐漸順利完成的，則中國的經濟情形下，混合制度農場的實現，必須先是自由的經濟組織開始。

農場的面積，原則上固以愈大愈合理想，不

過當推行初期却亦不宜十分過大，一因新式機械無力採用，過大反是阻礙生產效率之提高，二因場地過大場員過多，如無一般性的管理方法難免不有取巧者坐享他人勞作，或場員意見紛歧不易融洽。故如蘇聯，集體農場的平面面積要爲四八〇公頃，然如英美，五十英畝以下的農場使用現引機之比例却亦甚少，則中國混合制度農場的面積因此最小限度應爲二百市畝以上，而以不超過七百市畝爲原則，其適應性可隨地形去伸縮。在這大農場上，初從個體經濟進入集體經濟之小農或不習於協作耕作的，則宜採行分組的耕作制度，將農場成員組成生產耕種和畜牧等組別，每組再分爲若干工作小隊，撥付必需的生產手段任之進行規定的工作，而推行工作競賽來補充。

場員的參加，我人主張須以直接勞動生產者爲範圍，其所繳納的生產資金，可包括土地田舍牲畜種籽肥料農具現金和勞力，發給折價證券，以憑領取盈餘的分配。日後場員如欲退出，原則上亦可允許其自由，除其所參加之土地由農場按照市價購買，田舍牲畜種籽肥料和農具，且可請求返還。

混合制度農場的農民，除公有經濟外尚許可小限度內的個人經濟存在，在毗連農舍的地段可以擁有一定面積的園圃作爲私產，或畜養牧畜以爲家屬婦孺勞動的場所，補助家用。

則總之，混合制度農場的實現，先要由政府辦理示範入手而逐漸推廣，誘掖扶植農民去組織，故其初期，農場的組織也必須多包含自由的成分，這是聯合農場的特色，換言之，它尙是建立在農民個體經濟上（農民私有財產基礎上）的一

種集體的互助的勞動組織，其協作集體和公共性的擴大與嚴密，始漸進集團農場和集體農場的型態。

#### 二、管理和主持

怎樣使混合制度農場健全起來？還要依賴於管理方面的強化。

在農場本身，勞動成員的全體大會爲最高權力機關，批定農場生產計劃和收支預算，下設理事會和監事會，理事會爲執行機關負責農場經常業務的發展，設場長主持，初創時場長並可由政府遴派。監事會（1）監督農場的經濟情形，（2）督導場員的工作效能。

然而初創混合制度農場之健全起來，最緊要的尙是須政府主持，廣設曳引機站出租農場，站中並聘請農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補助農場人力財力之不足，並辦理農業金融機構，專以混合制度農場爲放款對象，透過這二個機關，政府要直接的去指導和管理農場業務之推進，而成爲實際的主持機關，使其生產能配合全國整個農業計劃，實行農業生產的地理分工，以發揮農業地理的優點。

大農場原係一個大企業，故其管理是否得當，有決定其成敗的作用，所以蘇聯集體農場的主持和管理尙爲黨與政府的中心工作，一九二八至三八年政府派充集體農場職務者超過二十五萬人，混合制度農場的初創時期，因之我們政府更須採取主動地位去主持和管理，這種主持和管理亦即爲混合制度的扶植與指導。

#### 三、收入之分配

農場收入分配之合理與否，爲混合制度滋長

或價格的一個關鍵。前面我們曾指出過它的一個原則，不生產者不得食，其分配的標準究又如何？

蘇聯集體農場的土地屬於國有，非為勞動農民所投生產資金之一，因之其勞動成員收入之分配僅根據所為之各種農業工作估價的標準「勞動日」，換言之，勞動日決定集體農場收入中每一集體農民所得的份額，較便的工作計算較少的勞動日，較繁重的工作計算較多的勞動日，一切工作從最輕易到最繁重共分七等，最低的一等簡單而不需任何熟練勞動的工作，以半個勞動日計算，第七等最高的一等，需要最高之熟練與更多經驗的複雜困難的工作，按二個半勞動日計算。在各個區域各個集體農場中，各種農業工作的定額又隨應用的生產手段，和各項條件如機器生產力、耕畜、土壤、播種場和收成率等之狀況而不同，然如勞動者能超越規定的工作標準和收成率，則又按照其勞動之質與量實際情形，可多得一個勞動日以為獎勵，反之，工作成績若在平均勞動生產率之下，必受懲罰，扣除其應得收入的百分之十，同樣的，生產成績優良的農場亦投資金。

這種以「勞動日」為估價與勞動的方法，年終時以為計算每一勞動日之可分得的產物和金錢，是多得多取少做少取不取不予的制度，且分配之總量又隨全體成員之勤勞而益增，則又直接關聯個人的收入，因此可以刺激勞動農民工作情緒與相互督促。故這一原則在混合制度農場中我們甚可取法，而筆者主張將這勞動單位分為四等：

1 輕勞動：如放牛牧羊及運輸材料等

2 普通勞動：如整畦肥土施肥中耕除草及收穫作物等

3 重勞動：如飼畜擠乳採蜜等。

4 專門勞動：如開駛曳引和抽水機及汽車等普通勞動每一工作單位依一個勞動日計算，其餘輕勞動和重勞動專門勞動比照普通勞動的工作單位另訂其勞動日的大小。

不過，聯合農場的土地原是耕者私有，其大部份生產手段和資金又係場員所有集合起來，因

其勞動或加應得收獲物之貨幣 =  $\frac{\text{收穫物價值}}{\text{總工作時間}} \times \text{勞動日數}$

這種根據場員所參加的生產資金來分配收益，在理論上原有欠妥之處，質言之，辛勞動作的貧農能因所投生產資金的稀少而影響其收入甚巨，故筆者又主張農場本身基礎逐漸建立以後，要大量的提存公積金創設公共資本，逐年收購場員所參加的土地和其他生產工具，達成農場共有的方法了。

### (三) 新農業階梯之推進

綜上所述，混合土地制度是使個體農民經濟過渡到經濟的集體形式之一種漸變方式，由聯合自耕農制發展而為集團自耕農制實現集體農制度。第一級的聯合農場是(1)場員提供各自所有之土地，將毗連接近之零碎地段合併成爲整塊耕地，實行共同耕作，(2)收益之分配依照場員所出之勞力土地和資本比例決定，(3)場員有退出之自由。第二級的集團農場呢？(1)原有土地和資

之，收入的分配除勞動量爲一個標準外，各農民所投生產資金的多寡，亦須視作一個單位去計算，用以獎勵投資吸收投資，故筆者主張聯合農場的收益，除提出一定比例之公積金公益金和生產基金獎勵金外，其分配各場員的可如下式方法計算，或爲實物或爲貨幣，農民可在一定條件下選擇，然其不供直接消費用的農產品由農場集中對外運銷變價，不得要求直接分配實物：

其勞動或加應得收獲物之貨幣 =  $\frac{\text{收穫物價值}}{\text{總工作時間}} \times \text{勞動日數}$

的集團自耕農制度，一面又視能力所及將公益金逐期用辦教育設施和娛樂設備，如子弟學校、補習學校、醫療所、娛樂場、圖書室、託兒所和農業試驗室實驗場等。

因此，在集團農場和集體農場中，勞動成員的收入分配要爲

本已爲農場所收購，(2)收益之分配純以場員提供之勞力爲標準，(3)場員之退出無一切附帶條件，(4)擴大公共事業，以逐漸達成共同生產共同消費之目的。第三級集體農場制度是(1)每一場員家庭仍尙可保留些許田地及住宅作爲私有，然在逐漸消滅之過程中，(2)以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爲主，(3)土地逐漸歸爲國有。一種由技術革命開始而漸漸完成地權改革的土地改革。

由此，我們可以把這如何使這一新農業階梯逐步推進。每一階梯的分野祇是地權所屬的問題，亦即收益之分配的問題或生產與消費之共

同性的程度問題，則新農業階梯的能否逐步推進，惟一主要關鍵祇為混合制度農場，其生產力增大和生產量的增加，以致可予集體經濟中的農民獲得在小農耕作之一般收益之上的收益，並享受到公共性的福利，這是頗具誘惑性的，然而它是不是可能呢？

第一、混合制度農場集合各小農場而取消其經界畝，故已擴大耕地的利用面積，因之作物地面積增大。如蘇聯自實行集體農場後，一九二九——三八年間作物地面積增加一千九百萬畝，農產量必致增加。其次，混合制度農場應用曳引機耕作實行機械化，並因大農經營之科學化，生產效率增高，每勞動單位之生產量與每土地面積單位之產量均可同時並增，蘇聯每人每日穀物生產量，一九二二——二五年私營農場上祇有三十公斤，一九三七年集體農場上增至九十八公斤。穀類作物每公頃平均產量一九〇九——一九三一年間祇有七五〇磅，一九三七年增至一〇九〇磅。故大規模農場不論其在蘇聯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集體農場，一九三七年穀物生產增至七十三億五千萬普特（每一普特等於四十磅），較一九二八年開始改造小農經濟為大規模的集體經濟時增加二十八億六千萬普特。在美國為資本主義制度的集團農場，一八四〇年穀物產量僅六億補，六〇年即增加一倍，八〇年再增一倍，至一九二六年已逾五十億補以上。農業生產率較人口之增加率猶為神速。

我們所以主張以混合制度來改革中國土地問題，其信念即建立在這個信條上，而預言新農業階梯的推進可以順利完成。

不過這裏面却亦存在着二個困難：

第一、中國已耕地與農業人口比率之失調：蘇聯集體農場制度之能成功，地廣人稀是一個重要因素。耕地多而農民少，為大規模的機械化農業經營之基礎條件，而我們呢，已耕地十三萬萬畝，農民三萬二千餘萬人，已耕地為全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十三，平均每人可分得耕地四·三畝，內地二十省每人平均且祇可獲得二·七畝。這種龐大的農業人口這種狹小的耕地面積，擴大中國農場的可能性因之甚小，因為可耕而未耕地雖多，佔全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二七。三，然此係指為物質上的可耕地而言，不是說均可得經濟的利用的，有些地方需用現代進步的農業技術始是可耕，有些地方非交通運輸發達與其他有利的社會及經濟諸條件具備後才有為人耕種的可能。

因之，已耕地與農業人口比率之失調，却構成混合土地制度成功的一重障礙。

第二、中國的技術停頓工業落後：建立大農制度的重要先行或平行條件是工業發達，尤其是機器製造業，則農業上的人力可以漸代以機器力，木製的簡單農具換以新式的農業機器。可是中國由於農業人口與已耕地比率之失調，勞動力過剩，農村中反有節省人力之工具被廉價的勞力所排擠淘汰，演成的技術停頓和匱乏經濟之惡性循環的情形。

要使技術停頓的現象消滅，須要工業發達吸收農業上大批過剩的人口，然而目前我們若使每個農家農場面積擴增一二倍，工業部門就得先收容近二萬萬人口，這在我們當前的都市工業各

方面條件都還遠够不上，因之却將影響我們脫離不了這個小農經濟的包圍。

那麼無法突破嗎？要衝破這兩重難關，就現存的情形而論，我們須建立鄉土工業來配合，什麼是鄉土工業？我們指大農場裏的農產品之加工和運銷等的工業，是一、農民可以不必放棄他們的農業而參加的工業，二、分散在鄉村的附近，三、所有權屬於大農場的農民全體，四、工業的原料主要的為農場自身可供給者，五、所得收益為全體成員所分配（註二）的鄉土工業。

要建立混合土地制度使中國土地問題之改革成功，初期我們是不得不設計一個農工混合的鄉土社區，以農工互相配合為中國土地問題謀解決的。故這種鄉土工業雖然在技術上因之受若干限制，不能充分現代化，但它可以輔助混合土地制度的健全化，混合土地制度的成功却可以促進中國工業化的實現——大量的資本勞力和廣大購買力市場之提供。

### 三、到土地國有之路

#### (一) 土地租稅制和土地國有制

土地本來是天然的產物，如亨利喬治(Henry George)所說，人類發生之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類消滅以後，土地也長此存留，實為社會所共有。不過自土地商品化後，私有制度當亦有其存在的理由，然而一因土地面積之不增性，二因土地位置之不動性，不能隨人口繁殖需要增加而供給增加，反之，所有權因此却有集中的一般趨勢，形成地主壟斷土地，耕者則無用的情形。

中國要為一個農業國家，土地支配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因之歷史上一般士大夫和富有社會思想的君主，莫不為尋求解決土地問題的究極辦法努力，三代有井田制度，新莽有王田制度，晉朝占田制，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太平天國之共產制度，雖都為一種平均地權的改革運動，然從其授田與還田的制度上研究，却亦顯具國有制度的雛型，換言之，土地國有化的改革運動實早為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勢。

據史的記載，夏商周的井田制度是

「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井田九百畝，公田居一」(谷梁傳宣公十五年)

「及均土地以籍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地官小司徒)

「一夫百畝，餘夫二十五畝，八家皆私百畝」(孟子)

「二十而授，六十歸田」(漢書食貨志)

井田制度是一、授田的大小以生活的必要和勞動能力為根據，二、勞動者祇有土地使用權而無所有權。

王莽改土地為公田，禁止買賣，「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子不過八，而田滿一井者，分餘田於九族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恢復古代的井田制度。

晉武帝承三國大亂之後，創設占田制度，「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三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一男一女共授田百畝耕作自給，另課以五十

畝二十畝或十畝的以為稅率。

北魏均田制度，男子十五歲以上受露田四十畝桑田二十畝，婦人露田二十畝，露田六十歲歸還，桑田永為世業。北齊均田制仍襲北魏，成丁受露田八十畝，女子四十畝，到六十六歲還田，另受的永業田二十畝不退。北魏北齊的土地均不得賣易。

唐制「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畝，畝百為頃，丁男中男給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世業之田，身死便授之承繼門戶，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舊唐書食貨志)。「凡庶人從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陝鄉而從寬鄉者，得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得復授」(新唐書食貨志)。

故占田均田制度下的土地一、已可自由處分買賣相易，二、不完全否認土地私有制度，然大體上以其授田還田而論，尚存一種國有制度的含義。

到太平天國，因是一種農民革命的運動，故其在統治區內實行了分給制度，是最徹底的生產制度；「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荒處，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帝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煖也」(天朝田畝制度)。

不過太平天國的共產制度外，井田王田占田

和均田制度在國有形態的性質上却是落後的，因為第一、這種土地國有是由於國家租稅政策的發

表。我們試考察當時實行分田制度的社會經濟背景，或是由於地廣人稀，有土無人耕種農業荒蕪，或由於兵燹馬亂之後，土地乏人經營，地籍又已紊亂，歲入銳減，因此實行授田還田的均分制度，配分土地予勞動生產者，以收取捐稅充實國庫，故雖是井田制度「公桑朽蠹，而三老凍餒」(左傳宣子語齊公)，「今一夫扶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祀用錢三百，餘千五百，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餼，又未及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勸耕之心」(漢書食貨志)。(引魏李悝描寫當時農民生計)

第二、共有私營的小農經營制度，此太平天國的共產制度亦然。「古者三百步為里，各百井，井田九百畝，公田居一」(穀梁傳宣公十五年)。「今一夫扶五口，治田百畝」(漢書食貨志)，所以結果呢「農夫所以常困」(漢書食貨志)。

歷史上土地租稅制的國有形態，故倘非我們所要求的國有制度，進步是土地國有制度也是土地國營制度，土地既歸國有，且由國家管理和經營，土地的收益為全體人民所公有，它比租稅制度因之實跨前幾步。

(二)從集體農場到土地國有

(下接第五頁)

## 談耕者有其田

王士奇

(一)

自從共黨實行土地改革，剷除地主階級，將耕地按人頭分配後，共黨宣傳，僅此一舉，解決了中國農業經濟問題，改善了農民生活，中國農民的貧乏問題，於此獲得了解決，政府區的一部份人，亦大聲附和說，這是國父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政府多年來未能實行，要立刻實行，農民如都有了耕地，農民的貧乏問題，自然可以解決了，於是大家都喊這口號了，五月四日南京大中學生的滿街標語中，便是以此為主的，茲就所見，略說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的意義，似乎是很明白，實在，則還少一完整的定義，所謂耕者，要是從寬解釋，那是凡是從事耕作之統稱，採用此種解說，則固然一切農戶均該是自耕農，而且還肯定了農工的僱用，因為被僱用的農工，是從事於農地的耕作者，即為耕者，耕者既必需有其田，僱工便必須減跡的，其次所謂耕者是專指從事於耕作之勞工，抑或包括從事於耕作經營的勞心者，從一般工業為比，那就是專指勞工抑或包括企業家，如專指勞工，則所有較大農場之經營均變成不可能，若兩者均包括在內，則變相的承認地主的存在，同時，佃農亦將逐漸變為僱工同時我們並應充份注意這耕者兩字是指既經耕作者，現時耕作者，願意耕作者三間之若干部份，若專指既經耕作者，或指現時耕作者，則對於可能的耕者就未免忽略了，若指三者全部，則耕者人數將大為增加，幾近於全部農民數加上失業人口數，故所謂耕者有其田，實在還需要一完整的定義。

以上是從耕者兩字來討論的，其次有其田亦未加皆定的解說，一般的農地，有所有權與使用權之分，此處所指有其田是指二者均為耕者所有，抑指使用權而已，若耕者指農戶，有其田是指使用權，則與現狀無別，即承認自耕農半自耕農佃戶同時存在，若指兩權并有，即祇許有自耕農戶的存在了。

(二)

關於土地制度，首先是討論土地是否可以私有，本文不作此理論的檢討，僅就主張公有及主張可以私有者兩說所可形成的土地制度統加說明，土地制度約有三種不同的形態，首先為國有制度，即將土地全部收歸國有，政府變成全國農民的地主，原來全國地主的收益全部歸諸政府，因其根本廢除土地私有制度，故凡因土地私有制度而產生的租佃制度的弊端，祇政府有決心有辦法，是可以全部清除的，但農民貧乏的其他原因依然存在。其次為自耕農制，即凡是農戶，均為自耕農，這種自耕農制，大多承認農業僱工的存在，為欲達成自耕農的理想，是可以採用溫和的土地改革政策，例如用國家或公共團體的力量，使佃農購買其佃耕的土地，將佃農問題緩和如果大規模而且徹底實行，在理論上是可以根本不讓佃農存在的。耕者有其田的說法，與此至為接近但是實際上要徹底實行，是不易的，簡直是無辦到的希望，因為農民的貧乏原因很多，地租不是全部原因，甚至還算不上主要的原因，在土地私有制度下，自耕農窮得無以生活時，土地的出資是很必然的，同時政府的財政當局，實難籌得如此龐大的財源，來幫助佃農給付其佃耕土地之地價，第三種可稱之謂新租佃制度，即從佃農立法着手，使租佃契約合理，保障農業經營人的權利和利益，也就是說，至少限度，耕農的勞働代價，不致受到地主的剝奪。甚至可以和地主同樣的分到土地自然生產力及社會共同努力所賦予的恩惠。

(三)

不少人對於共黨的分田政策，諸多迷惑，總覺得乾脆，痛快，神奇而愧哉不如故於此得一說共黨土地政策，在說明共黨的土地政策前，我們得先說明蘇聯是怎樣利用農民以奪取政權的。一九〇六年，列寧為欲擴展革命的隊伍，爭取兵源，顛覆社會秩序，在他起草的土地政綱中首先提出黨要沒收一切教堂的，廟宇的，皇室的，國家的，內閣的以及地主的土地，無條件的給農民，這是列寧煽動農民暴動傾覆沙皇政府極有效的口號，一九一七年革命後，為加強農民的煽動，決定土地政策九項。重要的為無產



階級政黨以全力直接接收俄國所有地主、教會、皇室及沙皇政府所有的土地。將一切土地無條件的交給有組織的農民團體即農民蘇維埃，或完全不受地主官紳所影響的地方自治團體，一切土地所有權屬於無產階級的政府，而土地使用權則移歸農民團體（農民蘇維埃）或地方自治團體，在一九〇六年列寧所能利用的力量很小，所以提出那種口號，促使農民暴動，以捉魚為例，那是先將水弄混的意思。至一九一七年時，社會秩序多已混亂，革命勢力亦以相當可觀，該是着手建立政權掌握力量最力的時候，於是農民蘇維埃急需建立地方自治團體，乃屬有利的中立者，是農民蘇維埃未建立區的臨時代用品或緩和劑而已。一九一八年時，蘇俄政府力量已相當充實，為鞏固政權計，開始清理異己，集中權力。這時的土地政策才轉變而為一種階級的利器。如土地社會化，以分化農民，削減鄉村間政治勢力的團結，強征食糧，充實軍需，建設集體農場確實掌握農民，在此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間，如青族地主，資本家，帝俄餘孽，白黨，富農，反革命者，均付人民裁判，格殺勿論，在這蘇俄革命時期，殺戮的人數，佔全國七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盡了清理的能事。

現在共黨就想搬演這一幕人類大悲劇，先套用國民黨平均地權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并主張廢除一切地主，祠堂、廟宇、寺院、學校、機關及團體的土地所有權，這是共黨的煽動農民暴動的辦法，其次是組織貧農團和鄉村農民大會，這是和蘇聯一九一七年的農民蘇維埃及地方自治團體同，是求掌握農民了，這貧農團更是希望其能完成同農民蘇維埃一樣的核心任務的，至於現在共黨主張對於家居鄉村的民主政府及人民團體人員本人，國民黨軍隊官兵，國民黨政府人員，國民黨黨員等等的家族能與農民分得同樣的土地及財產，這和蘇聯十月革命後，為安定政權，單獨對勇猛善戰的哥薩克人及農民的土地不沒收的用意一樣，所以現在共黨的一套所謂土地政策，祇是利亂的手段，破壞農民最重要的秩序即人與地的秩序，製造各種仇恨以燒殺造成恐怖而已。他們要，用無辜者的血來毀滅整個社會的秩序，由更多的血來重迷他們所需要的秩序，以蘇聯為例，則中國該殺掉六千萬至九千萬人的，當然無土地政策之可言。

## (四)

其次有一般人參照共黨的現行分田辦法及耕者有其田的極法，另擬辦

法一套的不在少數，此處僅引中國土地改革協會的土地改革方案來討論，該方案的目的為使全國農耕地應自即日起一律歸現耕農民所有，其實行辦法為現時佃農即日起取得其所耕土地的所有權，成為新自耕農，新自耕農對原地主清償地價，分十四年，每年交現租額一半，即正產物千分之一百八十七點五，原地主取得地價，喪失其土地所有權同時亦終止其交納土地稅的義務，政府對此項地價不課征任何稅，新自耕農即應繳納土地稅，即生產額之百分之十，兩者合計，共為生產額之百分之二百八十七點五，較之法定租額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尚不足百分之八十七點五，這樣的設計，政府財政協助的困難是免除了，佃農財力問題可以解決了，地主也尚可獲得一部份收益，不能全算是救了青蛙餓了蛇的辦法，其次這方案中對新自耕農的維護為規定凡非從事於自耕之任何人民，不得購買耕地，新自耕農因農業經營，必須借貸生產資金時，由各地國家金融機關負責通融，此項債務，只得收益為担保，不得因欠債而沒收土地房屋及其他生產手段在自耕農論者，這方案該算得上乘的了，但這種辦法是以新自耕農之收益在Any情形下均足以維持其全家生活為基礎；是以新自耕農世襲為必然的結果；而且為農地分割農業人口增加，似乎該另加長子繼承的限制同時還得假定不繼承的農家子弟均有充份的就業機會，均能維持其生活的；地主的利益，假定是應該不予考慮的。否則這一理想的方案即成為不理想的可能的白紙黑字了。

## (五)

中國老百姓每年有很多是直接或間接的被餓死和凍死，我們的國民所得不足以維持國民的生存需要，據估計，我國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是農民，農民因耕地的限制所得是不足以維持生活的，何況我國工商業不發達，沒有剩餘的工業製品或工商勞務或投資利息等以易取國外的糧食，然在我國的國際貿易中，還是有大量的糧食進口的，以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五年間為例，平均每年進口小麥九十七萬餘公噸，水稻九十四萬餘公噸，民國十九年至二十四年僅天津、上海、寧波、汕頭、廣州九龍拱北等海關平均每年洋米進口為一千四百九十四萬餘市担，加計其他各關，合計為一千六百九十九萬餘市担，我們的國際貿易情形如此，國民的生活是夠悲哀了，有人認為我們地大物博，人民的生活是沒有問題的，其實我們地固大，而物並不



博啊，以農業爲例，全國耕地僅約十三萬萬市畝，平均每人只分得耕地三市畝即半英畝，以如此的耕地，國內糧食的不足是意中事，美國耕地平均每人八英畝多智利六畝七，加拿大五畝七五，阿根廷五畝餘，澳洲三畝八四，巴西三畝二一，蘇聯二畝五二，南斯拉夫二畝四七，羅馬尼亞一畝八五，瑞典一畝五九，芬蘭一畝五七，以上這許多國家是糧食有餘的國家，并且這些國家內還有大量的可耕地保留着，沒有開墾，其次如法國一畝三二，波蘭的耕地，平均每人一畝二三，印度〇·七九畝，大不列顛〇·六七畝，朝鮮〇·五五畝中國〇·四九畝，日本〇·二五畝，這些平均每人耕地不到一畝半的，都是糧食不足的國家，惟法國波蘭英國和日本，均因工商業發達，以工商業的收得，足以易取國外足夠的糧食，并且是品質較佳的糧食，印度每人平均耕地還比我們多三分之一強，並且交通及工商業都比我們發達，但亦時常鬧着饑荒，所以我們的確普通的貧乏，貧乏得無以維持生活，農民的貧乏尤甚於其他的職業人口，那是無可逃免的事，惟農民的貧乏，並不是租佃制度所造成，至少不完全是租佃制度所造成現行租佃制度的罪惡在地主因佃耕者過多而得提高租額，剝奪佃農應得的勞働代價，至於地租之應否存在，本文暫不討論，在理論上，地主之應得地租該是等於土地自然力之所賦予及社會共同努力的成果，土地稅應該從這種地租上課征，現行地租是依土地的供需情形自由決定，因爲農業人口不斷增加，而耕地受自然的限制，無法作同比例的增加，因之每人無足夠的耕地，甚至全無耕地了，但是他們除了種田即無可謀生，不得已，流爲僱工或佃農，佃農自相競租的結果，地租逐漸上漲，佃農的應得利潤逐漸流到田租去了，再不得已，連他們自己應得的工資也流到地租去了，農工的工資也就日低一日，這樣的結果，造成農村普通貧乏，佃農無以爲生，同時全國資本家并沒全作地主，從事土地投資，土地投資收益還不算高，至於租佃制度之爲害在此，也僅於此。

假使討論土地制度的人是僅在研究除去租佃制度的害，並不如過去蘇聯的列寧，中國現時的共黨等別有打算時，祇要能使地主無法剝削佃農的應得利益就該滿意了的，若能使佃農與地主共分自然及社會的賦予部份，那就算真是理想的目的了。本乎此，地權問題的討論是多餘的，沒有必要的，換句話說，全部土地歸公或全部屬於耕者，救濟不了農民，餓的依然

要餓死，凍的依然要凍死，至多是由張三換李四而已，如果我們承認利息與地租的存在，也就說如果我們承認財產私有制度的話，我們對於租佃問題，採用佃農保護的辦法就夠了。佃農保護法應包括安定，佃權，限制不當地租，土地改良的價值，租佃糾紛的仲裁等，關於安定佃權，英格蘭佃農法有地主無一定理由解約或拒絕續租時，佃戶得請求地主賠償損失，德國有大農場佃作期最短爲十八年，小者爲十二年，分地爲六年，日本亦有五年之規定，愛爾蘭英格蘭及中國地法中有在租佃期滿後，非佃戶違反特定的條件，如欠租，轉租，破產及將土地荒蕪等，地主永遠不得解約，蘇格蘭及德國并有凡屬限制佃戶經營自由的特約一律無效。關於限制不當地租，羅馬尼亞及德國均有地租須由官廳或特設機構決定一最高額，我國土地法有地租不得超過收穫總額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的規定。一八八一年愛爾蘭土地法有地主與佃戶均有權訴請土地委員會根據佃戶租地的生產力決定相當的地租，一經決定，十五年內不能變更，其後英格蘭蘇格蘭及德國均相繼採用。意大利有獎勵成立佃租合作社，使佃農組織起來以與地主相抗，間接限制不當地租者。其次荒年減租，各國法律中亦多有規定，土地改良價請求權，一方面在保佃戶的應得利益，另一方面在鼓勵佃戶改良土地，增進生產，我國土地法中已有此規定，租佃糾紛仲裁制度的規定，在使租佃糾紛，能使地主及佃戶獲平等的力量與方便，使其糾紛能得合理解決，說陪審制，限制辯護人等，愛爾蘭蘇格蘭等的土地法庭組織均有此規定。

## (七)

帝俄於一八六一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和一九〇五年內閣大臣斯托列賓會先後實行土地改革，予土地饑餓的農民以長期貸款的便利，取得自有的土地，推翻不合理的農奴制及鄉村集產制，結果農民固然獲得了身體自由，但是饑餓的自由，更來得可怕了，農民怨恨政府僅給他有土地，設有給他充份的耕地，沒有給他麵包吃，中國現在的租佃問題已如上述，爲解決佃農生活的人們，爲解救農民饑餓的人們啊，他們希望有飯吃，他們并不希望自有耕地。

# 論充實發行準備

李鵬天

## (一)「備現」說

五月一日出版的經濟評論刊載「論瀾漫全球的通貨膨脹」和「論出售國營事業充實發行準備」二文，這兩篇文章對照一看，覺得有點南轅北轍。前者是引用凱恩斯的觀點來分析各國的通貨膨脹。後者則一認爲中國今日經濟危機最大的癥結是三種膨脹……的惡性循環所形成的逃走膨脹。逃走膨脹的主因，是人民對法幣失去信任，所以著者林霖先生「大聲疾呼，主張實行『備現』政策，充實發行準備，以恢復人民對法幣的信心，……人民對國幣信任，一旦恢復，物價必然終止飛漲，國家歲虧可以開始減少，濫發國幣自然可以停止。這樣，惡性循環，不打自破；逃走膨脹，無形終止。事半功倍，莫善於此。」

林先生的看法，可以代表一部分公私方面的意見；這個看法不但目下相當流行，在戰時也爲財政當局所樂道。我們說把兩篇文章對照一看，因爲我們以爲前一篇文章對於通貨膨脹的分析，相當正確，相當清楚；所以這樣的通貨膨脹問題，林先生居然以爲可以用充實法幣準備一法，使其「無形終止」，且有「事半功倍」之效，未免樂觀得近於天真的了。

國府在四月廿四日通過出售國營事業資產充實發行準備辦法，指撥若干國營事業、敵偽產業和賠償物資出售民營部份的資產，以美金估價轉

入中央銀行帳，然後發行股票或出售，作爲抵充發行準備的一部份。這個辦法的意旨極爲明顯，即和林先生一致，準備既然充實了，物價便應該穩定，一切問題因之迎刃而解。

我們依照常識判斷，把這些資產當着發行準備，而在現局勢下能有所作爲，極不可必。今日中國的經濟問題，源於發行膨脹，戰爭不已，現在說祇要把些黃金堆在庫裏就可以解決問題，真是一般人想都沒有想起的事情。

有人說，今日經濟政策之錯誤，在於諱疾忌醫，以及頭痛醫腳，腳痛醫頭。所以問題在政策。我們却以爲不然。任何經濟政策祇要理論上沒有錯誤，總會辦得通，辦得成的；但今日之問題已不是政策，而是權力，或魄力。比方說，建國特捐變成了救濟特捐，現在是彼此推托，拖一個沒完沒了；又如徵借國人在外資產，根本就不見下文。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所以歸根結底的說，上面兩種毛病固然是不錯，但這祇是表面的現象；政府目前所作的所爲，差不多都從阻力最小的方向着手，而不太注意其實效的所在。今日管制法令多如牛毛，但對象祇限於絕少數的小型企業活動，有門路有辦法時完全不在此例，到處是黑市，到處有後門，越管越管不了，如此而已。因此，從表面看，政府的政策固然有許多文不對題，但實際上例如禁門不賣救濟特捐的帳，主其事者，就束手無策；於是，除開這些文不對題

的政策而外，政府將無戲可唱了。

充實發行準備屬於阻力最小的一部分，因爲不過轉帳，辦幾項公文而已。這種表面敷衍的辦法能够解決幣制問題，自然除奇蹟降臨外，將一無所有。我們不太同意林先生的看法，認爲祇有加以澄清的必要。以下我們將從原則上及現實物價問題上來分別加以說明。

## (二)發行準備制度

發行準備制度隨着紙幣而演進，在硬幣本位時代，紙幣具有隨時兌換的能力，所以發行準備率的規定都極嚴格。第一次大戰以後，金本位逐漸轉變爲管理本位，工商業及國際交易日趨繁盛，加之經濟循環和國際政治經濟鬥爭的影響，一國通貨的發行，俱有膨脹的趨勢，其發行數量趨於適應國內公私經濟的需要爲準則，而不斤斤於金銀準備數量的多寡。這是正常狀態下的情形，中央銀行和財政部分開，發行不帶租稅的性質。反之，像中國目前的情形，增加發行是爲了供應公共支出，變成了無底洞，這就和準備制度脫了節，更談不上通貨數量運用的意義了。換言之，準備和發行之間的正常聯繫，在於單位貨幣的「含金量」極少變動，而後可以準備控制通貨數量，不然的話，準備與整個幣制是完全不相干的。

首先以英國爲例。一八四四年英國的皮爾條

例，規定英蘭銀行發行部的定額發行制，超額發行即需十足的現金準備；一九一四年八月的通貨與銀行券條例，即將此無彈性的發行制度加以修改，除現金準備發行而外，規定英蘭銀行經財政部同意後，並可增加保證發行，則準備的限制更為加寬。一九三九年至今，保證發行的限額計共提高十七次之多，減少限額祇有今年一月初以後的三次，目下的限額是十三億英鎊，一九一八年僅為二億六千萬英鎊。此外，在必要時，英蘭銀行還可以呈准財政部增加額外的臨時發行。(按：今年三月三日英蘭銀行的發行數約十三億英鎊)

我們不妨這樣解釋，在正常情形之下，通貨是整個經濟結構中重要工具之一，而由於控制經濟萎縮，各國的長期趨勢都是通貨膨脹，任何政府不能因為固執發行準備而放棄刺激繁榮的一項重要工具——物價漸趨上漲。至於在這次大戰期間，戰費和軍事消耗的急劇增加，英國無法不作有限度的膨脹發行，所以更使發行的彈性加大。但是我們要注意，這種擴張是有限度的，所以不會脫離正常的軌道。通貨是整個經濟的重要工具，但也止於是一項工具，沒有其他更神祕的意義。這和金屬主義的觀點不同，在重商主義時代，黃金就是財富，但今天美國黃金極多，依然在顧着通貨膨脹問題，所以這些問題的考慮，應該着重到貨幣制度以及它的環境，若是祇從發行和準備二點來討論問題，自然會莫名其妙。

現時英美兩國的發行情形，可以反證充實準備說之無謂。請先閱看英蘭銀行發行部在今年三月三日的一張帳單。

借方		貸方	
公債	一一、〇一五、一〇〇	流通鈔券	一、二三六、五二八、一二八
其他政府證券	一、二八八、三二八、六二五	存銀行部鈔券	六三、七一九、七〇五
其他證券	六四九、三八六		
硬幣(金幣除外)	六、八八九		
保證發行總額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金幣金塊	二四七、八三三		
總計	一、三〇〇、二四七、八三三	總計	一、三〇〇、二四七、八三三

英國的例子太合我們的用處了！一九三九年以後，英蘭銀行的黃金除保留一百萬美元而外，悉數移交外匯平準基金。在保證發行的担保品中，政府的公債庫券佔了總額的百分之九九·九五；照說英鎊應該一文不值了。中國中央銀行的發行方式，大致是這樣的，即財政部以國庫證向央

行借款，這國庫證便成為央行新鈔的準備；在方式和英國並無不同。

美國的情形不同一點，因為美國是富有的國家，藏金極富，聯邦準備券(即普通我們看到的美鈔)的後面是有黃金準備的。請閱下表：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底美國貨幣數量分析(單位百萬美元)

總計	黃金	金證券	聯邦準備券	國庫鈔券	合計
對金銀證券之保證	一一、六一四	一一、四一〇	二五、三三八	四、五五七	二二、二四四
國庫現金	一、二〇五			六六	一、三一四
備供銀行			一八、五四八		一八、五四八
存聯邦準備銀行			二、八一五		二、八一五
流通中貨幣			四七	二四、四七五	二四、五二二
				四、二四四	二八、七六六

美國的發行制度頗為複雜，茲根據最近的聯邦準備局月報加以陳述。

(1) 合衆國鈔券(United States Notes)和一九〇〇年的國庫鈔券(Treasury Notes)的準備——其中：僅五千餘萬美元為黃金準備。

(2) 一九〇〇年的國庫鈔券的準備——等量的標準與銀元為準備。

(3) 銀證券(Silver Certificates)——等量的銀條與銀元為準備。

(4) 金證券——等量的金條為準備。

註：目下以上兩種紙幣為數不多，收進後即予註銷。

(5) 聯邦準備券的準備——等量的金證券，或等量的金證券和合法的商業票據或聯邦的直接債務；各聯邦準備銀行對其所發行的聯邦準備券，至少需繳存其實際流通額百分之二十五的金證券於國庫。

(6) 以前所發行的聯邦銀行券和國民銀行券，去年十一月底祇各有三億八千萬和一億美元，目下也正在收回註銷之中。國民銀行券需十足的公債為準備，且不得超過資本總額，聯邦準備銀行券準備相同，但無資本總額的限制。

從上列六項和數字中，我們祇提出二點來討論：其一，聯邦準備券以及其他貨幣的準備，相當充實，主要部分就是大家愛好的黃金白銀。但是，美國對於大量黃金的流入，正感受一種膨脹信用的威脅。這是在金融制度上的：美國國庫收購黃金發出金證券，這金證券由銀行存入聯合準備銀行可以作為存款準備金，於是銀行可以因而增加放款，增加之數大約是一比六，換言之，國庫增加了一元黃金，社會上就多了六元通貨。這個現象目下正加強了美國通貨膨脹的潛勢，所以黃金多了也不一定就好。

其二，現時美國的貨幣以聯邦準備券為主，它是以黃金和公債證券作準備的。十九世紀下半期以來，由於經濟恐慌的威脅，聯邦準備條例屢有修改和補充，其關於發行方面的俱屬於增加發行的彈性。一九三三年羅斯福的新政更停止鈔券的自由兌換，到目前仍舊不變。這也說明了發行數量的重心，在於適應國內經濟，而不是着眼於「備現」的多寡。

如果以黃金一類的準備作為發行制度的尺度，英美兩國對於我們正可視為兩個極端的例子。

可是事實告訴我們，這類問題，對於兩國的物價問題（狹義的，尤指發行數量對於準備的有無豐富），遠不及其他生產、消費、國際貿易等問題為重要。以「備現」論者的眼光來看，英國必須有惡性通貨膨脹，和中國一樣，美國的人民對美鈔的信心必屬異常堅定，杜魯門總統真不必擬什麼反通貨膨脹計劃了。

以上是正常的情形，價格結構相當固定，準

年份	正 常 貨 幣	正 常 貨 幣 金 值	帝國銀行保有國庫券比例(%)
一九一九年一月	三四、五三六	一七、六九三	四五·七
一九二二年一月	一二四、四二六	二、七二三	四九·五
一九二三年一月	一、二九五、二二八	七一一	七七·三
九 月	二八、二四四萬億	七四一	九六·八
十 月	二、五〇四、九五六萬億	一四五	九五·二
十一 月	四〇〇、三三八、三二六萬億	四〇〇	九九·一
十二 月	四九六、五八五、三四六萬億	四九七	——

這裏我們可以指出兩點：

(1) 鈔票發行愈多，價值愈減，換言之，「準備」能夠因為幣值狂跌而「日見充實」。比方說假定目下的法幣總額為九十萬億元，昨天黃金每條黑市價四億元，今天漲到五億元，那末央行在昨天如有二百二十五萬兩黃金（合七千九百萬美元），今天如有一百八十萬兩（合六千三百萬美元），就可以稱為十足現金準備（假定以黑市外匯為準），「法幣準備異常充實」了。這話衡之一般常識，當然絕對不然。

(2) 德國政府發出的國庫券到最後絕大部分祇能拿往帝國銀行去貼現，民間是沒有人買了。這和我國政府拿國庫證向央行借錢，大致是差不

備制度不過是整個信用制度中的一員，中央銀行就依據環境的需要來運用它，這中間沒有什麼神秘的意義。

不正常的情形可以一九二三年的馬克為例。一九二三年德國的準備制度是比例準備和伸縮限制混合採用的。關於當時準備的情形一時找不着適當的資料，但我們可以用下表來加以說明：

反過來說，德國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後發行的地租馬克，其準備更其虛無縹緲。它的辦法是設立土地銀行，征用全國土地房屋作為保證，付給被征者一種抵押債券，然後再根據這種不動產發行金抵押債券作為地租馬克的準備。可是，我們必需注意，紙馬克崩潰的終止，即在地租馬克發行以後；當時頗多認為奇蹟者。不知道「備現」論者對此作何感想？

總而言之，光從發行制度來強調法幣準備的充實，以及從而採取實際行動，實在沒有什麼意義的；無論從理論上或實際上來看，都是一種錯誤的看法。德國的例子可以告訴我們說，法幣的

「準備」已經有了多餘，英美的例子則說明了準備之真義所在；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 (三) 法幣的發行和物價

這一節內我們願意從一個很單純的出發點來解釋人民對法幣信心喪失的問題。我們覺得這是近乎常識問題。因為十年來的物價繼續漲，不啻是對全國人民一種極深刻有效的經濟學教育。誰都知道法幣不值錢，誰都知道久存法幣必會遭受損失，漸漸的社會經濟結構也就自然的形成了種種便利。種逃避法幣行為的投機市場（廣義的）。這是現局勢一種最主要的經濟行為，其力量是無可阻遏的，不徹底而有效的政府管制自然更不在話下。

大家都在說物價的漲速超過發行的增率，通貨流通速度日益增加，所以這方面用不着多說。我們在此地要特別指出的，即是在這種惡劣局勢之下，政府的發行正在加速增加。

根據今年政府預算，上半年度每月平均支出十六萬億元，以一月份上海物價為準，四月份物價增加二倍強，又公教人員指數增加三倍，四月份的支出將在五十五萬億元左右；收支方面，預算每月十萬億元，即令和物價同等增加（事實上自然不如此，但較難估計），四月份新增的發行將在二十五萬億元左右。又據當局宣佈，三月底的發行數不到七十萬億元，那末四月份發行的增加率就到了百分之三十六之鉅，這是最低估計。

每月發行增加百分之三十六之鉅，而欲令物價不漲，或指稱物價高漲由於人民對法幣不信任，以及由於商人投機之類，這都是倒果因的說

法。政府不從本身力所能及的方面去切實改善，而把鉅額發行的責任置於不顧，不是合理的態度。因此，任何人從這個角度來看今日的幣值問題，很容易發現問題的癥結；這和發行準備之是否充實，簡直毫不相干。

### (四) 比較積極的辦法

準備和發行的連繫，主要靠在正常的發行數量之上，單位貨幣的「含金量」極少變動；在目前情形之下，充實準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照我們的估計，祇需央行有一億美元以下黃金準備，法幣的準備即將「異常充實」，請問一億美元能維持些什麼？

充實準備之說，因此就正如我們前面說的，是一種阻力最小的辦法，幾項資產轉帳是政府辦得到的；我們也同情政府籌措戰時財政的困難情形，反正這樣做做也不會有什麼壞處。此處我們祇反對學者們竟然在「理論上」予以說明，認為種種「大聲疾呼」無謂得很。

就林先生的說法，我們的意見，剛剛相反。林先生認為充實發行準備與吸收游資不能混為一談，我們則主張穩定通貨於吸收游資之中。在這方面我們贊成宋子文拋售黃金（不管在技術上以及其他方面的問題）的辦法，他的失敗祇在於仗沒打完而黃金賣光了，但祇少三十五年一月份以前的物價相當穩定，對老百姓不無好處。打仗得消耗物資，用國有資產換法幣，再用法幣買物資去打仗，總比用增加發行來「強購」物資要好。進一步說，若干國營事業與其擺在官僚手裏，

極可能沒有移轉到人民私營為有效率而「賺錢」；反正沒有給外國人。

事實上，若干國有事業如中紡、招商局之類，在軍事上用途很大，政府不能全部出讓；另一方面，除開豪門以外，也沒有誰買的起。所以出售國營事業在種種方面都有大問題。純從原則上說，如果政府能出售一部分，法幣可以回籠多少萬億元，對於當前的財政以及發行的膨脹，自然有抵消的作用，我們誠覺有其必要。至於技術方面的問題，以及中間有無漏洞，則不是原則上的問題，恕不多贅。

還有比較積極的辦法，就是向豪門動手。因為今日一般人民大都淪為赤貧，增加捐稅固然是負擔不起，就是興風作浪，操縱市場，其實力也有限得很。比方說，報上說這次競選費用有到萬億元的，目下任何最大的商業行莊的存款總額都不及此數，何況其他。

總而言之，充實發行準備一詞，憑常識說，是一種避重就輕的政策，在原則上就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本來沒有多談的必要；但也正因如此，我們上面所談的，大抵都成為題外文章了。政府在今日所應做的，應該做些切切實實的事，例如向豪門動手以籌措戰費之類。其他枝節問題，固然不必浪費精力，我們尤其沒有穿鑿附會的必要。（五月十日）

# 美國經濟恐慌與世界經濟

喬沅譯

最近美國傳來消息，說是市民購買糖，油和其他食品，為數極巨，使人回想起戰時物資缺乏的暢銷情形。據聯合社電訊，店主們說這種需要突然增加都是出於一種恐慌，而一個雜貨商領袖則說明這種恐慌，或許可以造成一種人為的物資缺乏。二天以後，法國傳來的消息，說是該國已處於嚴重經濟危機的中間。在葡萄牙，政府已經決定切斷奢侈品輸入。在巴西，棉花工業已經面臨着種種可怕的阻礙；紡織廠已經不得不關門停閉；棉花種植已經減少，而增植落花生以代替棉花的相對過剩。在英國，最近就將要求動用最後一部份的美國貸款。在中國，種種最主要物品的價格均已狂漲，同時進口則受限制而外匯又遭統制。

在美國，已故物價管制局長切斯特鮑爾斯(Chester Bowles)，早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內即已提出警告說：如果放棄物價管制，美國經濟必將發生物價大漲，消費減少，而最後就是通貨膨脹。一九四六年一月內，華盛頓郵報的阿爾佛萊德弗蘭特萊(Alfred Friendly)先生曾經寫道：「切斯特·鮑爾斯提出了一個勇敢的圖畫，但是他需要白宮方面的堅決援助。我們前面危機的嚴重情形，殆無足夠深刻的言詞可以形容。」

另一批經濟學家們，也提出警告反對放棄物價管制，但全國機製商協會，九個其他的商業團體，還有勞動領袖們，却都贊成自由經濟。最後，物價管制局終於壽終正寢，而通貨膨脹也就開始了。

當像美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工業巨人已經面臨種種經濟困難時，全世界當然均感影響。尤其是當一切其他工業強國均無力生產任何東西時，美國即已成長起來而居於全世界供應者的地位，這種影響就更厲害得多了。

正像重病一樣，通貨膨脹也有各種病徵；其中之一就是豐富的購買力結合着需購商品的缺乏——而這恰正是上述所傳美國內日用雜貨突然暢銷那個報導內描寫的情形，美國的購買力實在龐大；銀行存款比以前任何時期增加得更快，個人儲蓄存款，單只幾年戰爭時期內，就已增加到一千四百五十億美元。在工資和利息中付出去的錢，甚至在戰爭以後，也仍像一九四四年內一樣的高。錢真多得很，但是要買的商品不夠，美國既不夠，其他各地也不夠。

當美國經濟正在這樣的惡劣下去時，美元在世界市場上也買不到東西。美國的進口貨太少，其簡單的原因就只因爲美國願在世界其他各地收購的商品，大多數的價格均太昂貴。而且隨着美國購買的減少，其他各國却已面對着我們時代內這種不名譽的經濟病癥：美元短絀。

可是，隨着世界貿易在價值和數量二方面正在衰落下去；隨着千百萬中國人民不能進行生產，亦無正常的消費能力；隨着歐洲現在正處於經

濟孤立(除瑞士，比利時以及少數其他地點外)的狀態中；隨着英國出口貨儲量加多而進口貨則儘量減少，所以全世界正以最大的匆忙步伐，衝入一種危機中去，而二十年代初期的那次危機，如同這次比較起來，就將是一種兒戲之舉了。你可以說：我們前面的那個危機的嚴重性，殆無足夠深切的言辭可以形容。

這樁凶事的本源當然就是戰爭，但羅斯福總統在生的時候，即已舉行過多次會議，應付戰後的各種經濟問題。羅斯福的政府當初就已清楚警覺到，如不能及時發現種種補救辦法，必將有許多事故發生出來。世界銀行和基金當初即被認爲是二種最需要的預防方法，而現在它們果然是的。早在一九四〇年內，倫敦的新政治家與民族(New Statesman And Nation)雜誌即已談到，

當軍隊復員而且回復平民生活時，必將面對一切交戰國家的那種危險局勢。而到戰爭結束時，美國最輝煌經濟學家之一的阿爾文漢生(Alvin H. Hansen)教授，就已提出警告說：「在一個世代內發生二次世界大戰，就不能不造成一種難以消除的印象，而且使得甚至是最天真而粗心的樂觀者們，也不得不信服保持世界和平確非輕易的任務，而且如欲完成此一任務，同其他各國進行密切合作和繼續不斷實行合作，實是絕對重要的事情。」

可是代替密切的合作，我們只親眼看到了更



多的隔閡，更多的摩擦。代替迅速恢復歐洲的消費和生產，我們所看見的，到一九四七年底，却是最後實現一個計劃的種種準備，這個計劃雖然已經取名為馬歇爾計劃，然迄今仍未長成爲一個真正的計劃。而且代替真正的經濟也就是金融的合作，我們只看見美國正在日益榨乾全世界的黃金，並且正在收購出產地的黃金——深藏在地面下的黃金。全世界遍地雖已發生美元短絀和黃金短絀的情事，然而美國的收購黃金行動依然進行不輟。但當那位傳說上的非列基亞(Purtygio)王密但斯(Midas)，受到許諾凡他所觸摸到的東西均可變成黃金時，甚至他自己的一只脚和女兒也都變成黃金；當美國正儲藏着正在日益增加中的黃金數量時，但處於財政部比較前更窮而準備金更少之際，美國現在用金子買東西，却比她所力能購買的遠爲稀少。顯然地，密但斯已經將他自己的手和腳綑縛住了。但其他國家的命運，却完全依靠在她身上，以及她消費全世界大部份生產的能力之上。

無疑地，現在正有一種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那一次，更爲無限危險的經濟局勢在發展中。它是當那個金錢饑荒之首都拒絕注意却斯脫鮑爾斯的警告時開始的。它是當商品需要日增迅速以是供應變得更少時；當人力困難變得明顯時；當因市場供給減少而價格日增以致金錢變得「燙手」時開始的。消費者們覺得「燙手」的錢正在燒痛他們的手指；他們要用掉它；它在今天可比明天買到更多的東西；但那時正當消息傳來，美國一家大銀行，雖在本年初得意揚揚地說，「消費者的消耗保持在歷史上最大水準之上」，而且還

有另一家美國銀行在今年中期聲稱，并無世界金元短絀的情形可見——這一切除事實的內在真實外，都是最出色的消息。消費者的消耗量所以高，那是因爲金錢「燙手」的緣故。而當據說一般地并無——而且甚至在今天——金元短絀的情形之時，美元却在處於正常環境下它們購買力最爲巨大的那許多國家內，實在均感缺乏。

隨着中，英，法和葡萄牙正在限制世界生產的消費，而且隨着美國已經面對着食糧缺乏——同時其他各國內的千百萬人民確實正在挨餓——我們正在注視着悲劇的第一個行動，它同歷來的規律不同，是以一種喜劇開場的。這場喜劇是當美國大商業團體，不僅要求撤銷物價最高限額，但也要求取消一切政府管制的圖爭獲得成功時，而且是當美國工人領袖們（他們中間有頗具各的約翰路易斯(John L. Lewis)在內)承認，他們要求增加工資，其意義就是即使他們是在幫助僱主爲他產品取得更高價格，他們也仍要增加工資時間的。在那個時機上，國際經濟合作就越來越困難了。因爲全世界各地的人民均不能獲得更高的工資，而所以也就無力購買奢侈品。他們就只因爲沒有必需數量的美國洋錢。他們也無力用美元來收買原料。而且因爲他們不能購買足夠的原料，所以他們也就不能夠地輸出物品。而且因爲他們不能輸出，他們的美元準備金也就越變越小。這就是歐洲的狀況，中國的狀況亦復如是。

必將產生世界市場上重要物資的益形缺乏，結果生產就跟着減少下去，而消費的減少必更厲害。於是各國就更無金錢來買「奢侈品」，而甚至巴西和荷屬東印度的咖啡，中國和印度的茶葉，中國和日本的絲，以及其他許多同類的物品，都將被人認爲是「奢侈品」。但是一切美元的物品，確將都成爲真正的奢侈品，因爲它們的價格，對於那許多美元準備金正在縮小的只能購買最緊要輸入品的國家，顯然極爲昂貴。

當所有這一切事情正在醞釀中，若干人士已在反對援助歐洲和援助中國之時，那堆積在諾克斯(Knox)堡壘內的黃金，就只是密但斯的幻夢，以及他的黃金脚和黃金女兒罷了。(譯自密勒氏評論報)

(上接第四頁)之我們待集體農場業已建立一個嚴密而健全的公有性質農業經濟制度，農民便潤於集體經濟的福利中以後，政府可以宣佈土地屬於國有，不准買賣與租佃，然仍共集體農場無償使用。沒有參加集體農場的獨立生產者欲成爲富裕的農民，因此却必須自願的結合起來，組織集體農場以公共的生產工具與有組織之共同勞動，從事集體生產。

而後，逐漸走上國有國營的理想，土地既爲國家所有，並由國家管理和經營，收益爲全體人民所共享，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蘇聯的土地改革最初是去地主來實行國有國營之土地改革，但是不久即因之發生農民的土地退還，今日改革要走的蘇聯所取的反方向，土地進行，由耕者有其田而實行混合土地制度，不流血，也沒有怠耕。

(註一)參閱卜凱著「中國農家經濟」

(註二)費孝通先生主張復興與鄉土工業來增加農民的收入，其辦法，原則上與土地制度的推定，關於鄉土工業詳情，許崇清著「申論鄉土工業」

(大公報三月十七日星期論及九月十七日論



# 鴉片戰爭中的林則徐

彭燮笙

中國歷史發展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了二千年來所未有的變局。作為這劃時代的標幟事件，便是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年）。最能代表清國嚴格閉關封禁經濟思想之實踐發展的，要算是林則徐的外交了。他又是此段歷史大轉捩的關鍵人物。

自英國輸入鴉片數量日益激增，始而引起中國朝野的注意，終至感到極大的焦灼。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清廷乃授命當時極有政聲的湖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辦。他在還年冬天進京，十一月十五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向皇上請訓。時今文學家龔自珍正居官京中，因不滿意于他卑微的職位，有意南行。他便寫了一篇「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藉以表示這點意思外，並向林則徐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城義，要他能在兩年內將鴉片禁絕，杜絕洋貨入口，「使中國十八行省銀價平，物力實，人心定。」這是希望禁絕鴉片輸入，不但中國人民的生計健康不致深受毒害；同時若能遏止外國商品入口，亦可使中國的農業經濟社會免于破壞，賴以長久維持其自給自足的安適生活。

林則徐以文臣孤入廣州，輿論得宜以重兵自隨，一方面防止「夷人」思逞，一方面藉防奸民蠢動。同時更應講求軍備，修整火器。「夷人」應令其徙出澳門，不容有「夷館」讓「夷人」停留，作互市的棲止。他更勸林則徐刑亂邦用重典，並說這非古人于陸路開邊疆之可比。他又恐其態度不堅定，失此千載一時的事機，並引詩經憂心悄悄之義來勉勵他一番。

道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一八三九年一月八日）林則徐出京，讀了這篇文章深受感動。回信皆以「旌旆之南

，事勢有難言者」外，並寫道：

「出都後，於輿中細繹大作，實難陳義之高，非謀議宏遠者不能言，而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歸墟一義，足堅我心，雖不才曷敢不勉。執事所解詩人悄悄之義，謂彼中遊說多，恐為多口所動，弟則慮多口之在彼也。如履如臨，曷能已已！」

林則徐此行經由直隸山東安徽，皆無停滯，惟江西途次，連遇大雪，旋即加速前行。次年元宵節後十天（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行抵廣州，下榻在布政使後街的越華書院。當即和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等多人會晤。不久開始詢訪，規畫形勢，籌防守戰。鴉片如何偷運，煙販團集何處，他抱定無比的決心來禁煙。龔自珍的評言，自然尚不致忘懷。這時他又聘請馬禮遜教育會（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中的學生，繙譯西文書報中有關資料，以為「知彼」之助。現在可能考知的，梁德德為其中的一個。他的主要工作是將澳門出版的英文報紙譯成華文，以備林則徐將其重要之處轉陳清廷。此外林則徐叫人將 Murray's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繙譯，即所謂「四洲志」。這些文獻為魏源所得，用以輯成那有名的「海國圖志」一書。一般記載說林則徐到了廣州「使人日探刺外洋情事，繙譯洋書，購其新聞紙，具知洋人貌。」即指此而言。當時「澳門月報」也批評「中國官府不知外國政事，又不詢問考求。惟林總督（即指林則徐）行事，全與相反。署中養有善譯之人，指點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處探聽，按日呈遞。」由此可見林則徐想瞭解西洋文化，追求進步，這是和他同時的任何人所不及的地方。

他到廣州稍久，各方面的情况有了相當的明瞭之後，在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一八三九年三月十八日）即開始執行任務。首先嚴諭行商，限三日內向「夷人」取得永不夾帶鴉片的甘結前來稟復，否則「即恭請王命，將該商擇尤正法一二，抄產入官。」同時另有一諭帖交由行商轉致「夷館」，要他們將船上的鴉片全部繳出，驗收燬化；並出具甘結，永遠不准夾帶，否則「一經查出，貨盡沒收，人即正法。」因鴉片為害人之物，林則徐認為英國祇知利己，不顧人道，論理應該禁絕。但是華民的吸煙與販賣，若無外國人運來，自無從獲得。為了正本清源，乃從禁絕鴉片貿易着手。實行此項命令時，林則徐即派兵包圍廣州十三行，不許任何人離開，撤退華人僕役，嚴禁食物及飲料的供給，並截斷十三行與外船之聯絡。英國商務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聞訊即自澳門趕到，與其國人同受囚禁。二月十三日（三月二十七日）他替英國政府肩起重担，把英商尚未售賣的鴉片繳官，共計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並簽發倫敦國庫支據，償付商人繳煙的損失。於是十三行之圍即解，義律恢復完全自由後于四月十二日（五月廿四日）率全體英人退走澳門。

義律交出的鴉片于四月廿二日（六月三日）在虎門海口盡行銷毀了。但林則徐的難關，自此纔算開始。因為鴉片貿易並未根本絕滅，不過暫時停頓，大量供給的來源原在印度，有許多且已在運華途中。其中有些固已暫囤于新嘉坡，惟不久就在中國沿海找到了市場。大利所在，自然有人被誘冒險。如華事月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指陳說：「這種交易似乎和從前一樣的興盛，且一樣的安全，一樣的有利。」其實當時滿

（21）

清政府，不論中央或地方根本沒有禁煙機構，亦無道義的乃至武裝的力量，足以和廣闊的大批走私者對抗；且更爲應付林則徐的稽查，走私者和走私方法也都改變了。「主要的經理人：不復駐在中國，他們大小船隻都配備人員武器，足以武裝華方所有船隻使其自衛，也有許多華方走私者自行武裝起來抵抗本國政府的緝私官吏。」

據估計此時走私船隻計有大型帆船和三板帆船十六艘，每艘有三十人至九十人，鎗六枝至十六枝。大型和小型雙桅帆船二十七艘，每艘有二十人至六十人，鎗四枝至十二枝。自然林則徐也深知他所指揮的機構，力量不足以直接和此類鴉片走私者周旋，所以乃別尋辦法。他所頒強迫外商交出鴉片的命令中，不許今後再販運鴉片，要外人作集體保證，不僅對現已在華者爲然，且對將來來華者亦同樣有效。林則徐對他們說：「爾等來至天朝地方，即應與內地人民同遵法度。」「譬如別國人到英國貿易，尚須遵英國法度，况天朝乎？」可是按照英國人自己的觀念，保證尙未來華的那些人的行動，或預先替他們承認罪犯（包括死刑），而又沒有可靠的人證物證，不經審判，實不可能，故爲義律拒絕。

不過他國商人水手都已具結，獲得貿易自由。惟獨英國人頑強不馴，這雖然頗使林則徐驚異爲難。英國人既被逐于澳門，乃退避香港和附近島嶼的船上，遵從義律的命令不進入珠江交易。然實際上貿易並未停止，英商貨物即在船上，在別國船隻旗幟下運入廣州。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 Co.）便在香港黃埔間經常設有轉運機關，英船仍可裝運茶葉出口。故道光十九年英國對華之重要貿易雖受阻礙，但暗中仍然照常進行。

林則徐之所以堅持外國商人要服從中國的法律，那爲了要尊重中國的主權。如他和義律爭論公文平等格式問題說：「天朝以大字小，凡外夷來至中國貿易，恪遵法度等無不仰遵柔遠之恩，不得率將相和字樣，寫入稟內，致與體制不符，有干嚴飭。」義律答道：「英吉

利乘公操權，在普天下各國無能超之，而遠職藉詞與其權勢相符者，並無意欲犯于天朝體制。且遠職既爲英國特派官員，敬請大憲諭內不要仍用輕慢文字也。」最後林則徐是這樣的駁斥：「本大臣節次所諭，無非聲明義理，訓誨成全，有何輕慢？至該國比別國權勢如何，天朝不值過問，毋得率臆混陳。」從這裏很明顯的看出兩朝大勢力發展的矛盾，都想爭取政治上的主導地位。

其次，如外國人在華犯罪，要用中國法律來裁判，這以處理五月廿七日（六月廿七日）英國水手在香港沙嘴村附近擊斃華人林維喜一案現得最明顯。林則徐認爲英國人在中國領土以內殺害華人，而不假中國以裁判權，殊屬有傷國體。當時請在廣州傳教兼眼科醫生的美國人伯駕（Peter Parker）將滑達爾的「萬國公法」（De Vattel's Law of Nations）中關於戰爭、封鎖、扣船等數則譯成中文，籍作參考。由此他懂得，凡外人犯罪應照犯罪所在地國法治罪。他便嚴諭義律交兇由中國按律懲治。義律則堅持要按英國法律治罪。這樁案件終因義律抗不交兇，以至于中英啓釁，結果成爲未了的懸案。林則徐之所以堅不讓步，謂「一人漏網之事猶小，而外夷壞法之罪難容。」

這一連串不愉快的事情發生，已使兩國關係漸臨于戰爭的邊緣。九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三日）中英水師在穿鼻洋已短兵相見，同時英國政府亦先後接到廣東商館被圍和商務停頓、緞烟、索兇和英人被追離開澳門的報告，大爲震憤，乃于道光十九年底（一八四〇年二月間）派遣遠征軍東來贛師問罪。陸軍由懿律（George Elliot）統率，並指派爲和議專使，義律副之。海軍由伯麥（Gordon Bremer）率領。懿律等于道光二十年五月尾抵粵，其時英國軍艦在中國海面者計有戰艦十六艘，武裝汽船四隻，運兵船一隻，輪送船二十七隻，軍器完備戰士約四千人。隨即發動攻勢，五月廿九日（六月廿八日）起首先封鎖廣州，六月初七日（七月五日）

陷浙江定海。六月三十日（七月廿八日）由舟山動身北上天津。此次英軍行動乃是根據英國外相巴麥尊（Lord Palmerston）于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日（一八四〇年二月二十日）的訓令。訓令中指示其對華的策略說，英艦抵粵後，可向兩廣總督送遞外相致中國宰相的公文，令其轉呈北京。公文複寫三份，第二份或即在舟山對岸或在長江口，或在黃河口投遞與當地總督轉呈，第三份則在白河口送遞，以便就近轉呈清廷。英艦應佔領舟山，封鎖珠江、長江、黃河及舟山對岸的海口。至白沙後，英國代表應另具照會，要求中國答覆致其宰相的公文；並應告知滿清官吏，英船將在白河口靜候數日，以待北京當局的正式答覆，或派全權大臣談判亦可。如置之不答，或答覆不完滿，至繼續交涉無望時，可即訴之于軍事行動。同時白河離北京很近，英艦來此威脅，必能引起清廷極大的恐懼，而雙方公文往返尤爲迅速。所以選擇此地進行交涉實具有極優勢的條件。其後直隸總督琦善與英人在天津大沽的談判，即因此需要而產生。

在此以前，林則徐在廣州基於實際的觀察，即知中英戰爭無可倖免。在虎門焚煙時，有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 C. Bridgeman）前往參觀。林則徐和他談話中屢次問及英國海軍的實力——而最關心的是汽船。當其聞知英國軍之強，中國望塵莫及時，深表憂慮。於是他竭力向外國購買船砲，曾奏請以粵海關稅收「製砲造船」，爲「整飭海防」之備。因「船砲本爲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猝辦，而爲長久之計，亦不得不先事籌維。」同時爲了截長補短，他採取對抗英軍的戰略是要「誘擒于陸地」，以圖一舉殲滅。因爲「與其交鋒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中英兩國的實力孰優孰劣，他看得很清楚，早已胸有成竹。後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間，他被請戍伊犁，在蘭州時寫給友人的信中曾指言「器良技熟，胆壯心齊」，中國皆不如人，實已暗示中英鴉片戰爭

，清廷在軍事上的失敗，是無可避免的結局。

既然林則徐知道中英勢力懸殊，爲什麼不公開坦率地提出，向朝廷建議及早克服軍事上的種種弱點？因爲當時滿清朝廷以異族統治中國，政治表現爲絕對專制主義的作風，言論思想早已受着嚴密的禁錮，那裏會容許一切人民和正直的官吏能知無不言呢？況且當時林則徐的處境也並不如我們想像中的願意，妥協份子穆彰阿在朝就對他竭盡「傾排」之能事。穆彰阿是滿人，又掌握軍機大權，道光帝是個最無主見的人，不免要受他的影響，馴致對林則徐信任不專。林則徐要保持緘默的態度，重視個人的名譽以至其於國家的利益，那是專制主義惡果下的必然傾向，尤其是林則徐生長在那個舊社會底人物。

比如道光帝接到林則徐繳煙的奏報，很嘉悅他辦事得體，批說：「覽及此，朕心深爲感動。卿之忠君愛國，皎然于域中化外矣。」不久，林則徐驅逐英人到香港，中英關係日趨惡化，道光帝又激勵他說：「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誠卿等不可畏慮。」可是自中英兩方開始武裝衝突，及英艦北上，進迫天津之時，北京朝廷已受着嚴重的威脅；更由于疆臣們的怯懦，張皇失措，道光帝竟茫無主見，往日對林則徐的信心也就漸行喪失了。這一情勢的轉變，林則徐自然豫在鼓鑿。他在廣州仍然一鼓作氣籌畫戰守。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八月十九日）正當英艦屯泊天津白河，道光帝憤怒之際，適逢林則徐繼續拿獲販煙人犯的摺子到京，他不假理智的考慮即殊批道：「外而斷絕通商，並未絕斷；內而查拿犯法，亦不能淨。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何以對朕也！」正在這個時候，林則徐以英軍在浙江洋面「妄肆鴟張」，在廣東洋面又擄去海運糧船，遂親赴獅子洋檢閱兵勇，擬即出洋攻剿。他把軍事計劃報告朝廷，不但不能獲得同情和採納，道光帝反而說他「顯因夷兵滋擾福建浙江

，又北駛至天津，恐以粵東辦理不善，歸咎于該督，故作此舉，先占地步。所謂欲蓋彌彰，可稱憤兵也。」後來接到他的戰報，又罵他「貪功啓釁」。九月初三日（九月二十八日）遂特旨宣示林則徐「誤國病民，辦理不善」的罪狀，命即來京，聽候部議。當其去職的時候，會一度向朝廷陳述他最後仍想努力的願望。他申言鴉片必須嚴厲禁絕，「夷務萬不能歇手」，自請「戴罪赴浙圖剿」，表示「一身之獲皆猶小，國體之攸關甚大」，「苟有裨國家，雖頂踵捐糜，亦不敢自惜。」到了九月初八日（十月三日）就正式革職了。

關於林則徐去職，舊日史家如夏燮記載，謂「義律之所慮者，不在于浙，而在于閩粵，故必謀去林（則徐）（鄧（廷楨））而後定海之師可緩；必先去文忠（案指林則徐）而後粵東之志可逞也。」此論不足置信。案道光帝革林則徐鄧廷楨職上諭中有云：

「此次英人各處投遞稟帖，訴稱冤抑。朕洞悉各情，斷不爲其所動。惟該督以特派大員辦理總無實情，轉致別生事端，誤國病民，莫此爲甚。是以特加懲處，並非因該英人稟訴遽予嚴議也。」

據此可見林則徐等之去職，實因其辦理不善，觸怒了道光帝的肝火。及後義律和琦善在廣東交涉時，尙謂「前任督部堂林鄧稱職一節，與英國無涉」，均可證明。

此種傳說之由來，亦可看出當時人對林則徐抱不平之處。比如他雖和英人發生正面衝突，却不曾和英人正式以兵戎相見，一較高低，固使林則徐保全了他的名譽，而於當時人則引起一團疑竇。他們最不能理解的是道光二十年夏天林則徐尙未去職時，英軍爲什麼不逕行攻打廣州，而要向浙江定海開始攻擊？到了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一八四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英軍又爲什麼要打廣州？像粵民討英人檄文中即說：「爾自謂船砲無敵，何不於林制府（案指林則徐）任內攻犯廣東？奸

相（案指琦善）受爾籠絡，主持撤防，故爾得乘虛而入。」其實，英軍首次開火不以林則徐爲攻擊的對象，是由於廣東特殊地形作了屏障。英軍不攻打廣州，而要襲取定海，那是他們既定的軍事策略。因爲他們想解決中英之間的問題，非直接威脅北京朝廷，答應簽訂一個滿意的條款，以後通商即不能獲致「安全」的保障。滿清政府最怕英艦北上，威脅「畿輔重地」，希望在距北京遠處的粵東就撫，而英人却偏偏不依，一開口即聲言「攻打揚子江，直抵京師講話」。可是林則徐就在這個矛盾中得到了便利。至於其後廣州之戰，並非出於英軍主動。時楊芳與義律正進行停戰恢復通商的交涉，奕山本人亦無戰意，不過一方面因朝廷的督促，要他「一鼓作氣，殲滅醜類」，一方面因在粵將領又多「密請開仗」。正在和議期間，奕山迫不得已乃派兵出擊了。英軍這兩次行動，並不是對林則徐有所畏懼而有意選擇攻擊的地點。廣州之戰的時候，林則徐仍在廣州，奕山在粵的軍事佈置，常常是向他諮詢意見的。我們試想：即使林則徐真有機會和英人一決雌雄，也未必能夠取得確切的勝利。他不是早就明白交鋒並無把握，而自嘆「岳韓束手」嗎？

正因爲林則徐在廣東時不曾有綠和英人比武，後來雖一度起用辦理浙江軍務，仍然是不得和英人一顯身手，所以道光末年一般人要飲恨在心而不服輸。固然這是他們味於外勢的一種虛構，而林則徐却因此在近代歷史上成爲一個失敗的民族英雄。

# 介紹工業經濟的一個新動向

老兵譯

## ——福特公司的新政策就是把人當人看——

逐年逐月逐日和你在一起工作的人，無論他是一個工人、領班、或者是工頭，或者是無論任何人，記住，對於你，他是代表公司的一份子。如果這個人被他的主管推推扯扯，或者是受到了命令而不得理由，記住，你一樣也有機會被人推推扯扯，或者是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心情下來工作。今天福特公司人事關係的要點，是要建立起一個工人、領班、工頭、和各主管全站在一條戰線上

的隊伍。我們深切相信，有人和纜有成功。

亨利福特二世

亨利福特這個名字，對我們似乎還不覺得生疏吧。他是美國工業界中創造裝配制的第一人，同時也就是福特汽車公司的大老板。今天，美國工業所以能進入這個夢想不到的繁盛和大量生產的階段，不能不歸功於這位怪傑。亨利福特雖然享有這樣的盛名也擁有了無限的財富，但還有人批評說是他過於偏重了機械而忽略了人生，美中依然不足。

現在，亨利福特二世，他就是老福特的孫兒，年齡不過三十，但他却發現了這點錯誤而決心從事改正，使人生和機器在新型的工業中同處平衡地位。

這個面團而和親可親的小亨利，做了擁資數百萬的福特汽車公司總經理僅僅不過兩年，他就有本領把福特公司整個地翻了一個身。在這改革的幕後，隱藏着一種不可量度的推動力，這就是福特二世對於「人與人關係」的主張。

小福特說：「大量的生產是關於機器和人工的相互合作而成」。假使我們「地瞭解」人與人的關係」在工業上所佔的「地位，相信

未來的十年當中我們一定能在減低成本上面得有進步，而可以和過去二十五年來側重機器的成績相媲美。

「人與人的關係」這句話，在小福特看來，是比他日常在本市和他那六百個附屬機構接觸尤為重要。這意念，並且延伸到他和其他數千個職員之中以及在業務上有來往的商行，一直擴張到各分支公司所在地所接觸的一切羣衆。他對於這一個信仰的堅定猶如遵守聖經上的金科玉律。他始終相信以人情來待人是比什麼都重要。

在他接受總經理職位不久之後，他就坦白地發表他的意見，他說：「這不再是專靠一個人主持的事業，這是整個隊伍逐步前進的陣容」。

今天福特公司的員工，不再像以前那樣相互地唧唧訴苦的情形了。大家都感覺到滿足和高興。凡是看見過去和現在的年資較深的員工都禁不住這樣說：「這樣一來，好像各人心上的石頭都落了地」。

小亨利對於勞工問題的見解，是完全根據愛摩羅柏 (Elmo Roper) 的測驗作張本。愛摩羅柏

認為每一個美國工人都需要實現他們所追求的四個基本願望。第一是安全的保障，第二是進展的機會，第三是要被當作一個人看，不要看作祇是工資單上的一個號碼，第四是保持人類的尊貴心情，使每一個人都覺着他所做的工作並不單是為個人生活，而同時亦是對於整個社會有益。小福特完全贊成這種見解。所以他說：「無論任何人，倘若他能够使得他的部下滿足上述這四點願望，他就是得到了診治勞工問題的良方妙藥」。

小福特實行這個開明政策以來，時間雖然不夠，但已經足以顯出效果。在一九四五年的最後九個月中，工人申訴事件每月平均有二千三百八十七宗之多。到了一九四六年時，這個怨憤率就幾乎減少了一半，平均每月祇有一千一百八十八宗了。到了一九四七年的年底再減到每月祇有一千一百三十宗。許多研究勞工問題的專家都一致承認是怨憤率的高下，很可以代表勞工條件優劣的指數。由此可知小福特的計畫是很有成效，而且是足以博取人心。

他和美國領事聯合會的交涉尤足以明顯地表

示他那專務實際的作風。因爲那領班們的出路，公司在七月裏取消廠內領班制時，小亨利會對新聞記者說：「假使你希望一個領班的確是公司中的一份子時，你得先使他覺着他自己是公司中的一份子。譬如說，給他們最近工作地點的停車場及他們自己的殘室。此外，他們也用不着在到工鐘上打洞，又不用像一般工人那樣佩戴指定的證章，只要備有工作證就行了等等，都是逐步提高他們地位的措施，使得逐步發生自覺。設使領班中的工資有較一個上等工人還要少的，那我就立刻將他的工資，加以調整」。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並已採用了一種領班代表會的制度。任何領班有不滿意的事情，他儘可告知這代表會。如有必要，代表會便馬上把他申轉到最高首腦部中來。同時我們並開始辦理領班訓練班。使得每個領班，都有改進他的職位的可能，而公司方面亦隨時隨地給他們有上升的機會。我們並且舉行有連續性的聚餐會，使領班們和高級職員常常接觸。在這聚餐會中，不單祇是聯絡感情，更重要的是使他們人人都有機會知道公司內部最近的情形和進展的動態，使他們每人都深深地感覺到，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與公司息息相關」。

最近在某某集會中，小亨利對着一般監工員說：「我們舉行這種會議的目的，並不是假此機會來發佈命令或定下什麼條文，我們是想借這集會的機會，相互地多學到些東西。我和你們所談的，你們就可以和你們左右的人談，而他們同樣地也可以去和他們的人談。相反的，他們有意見，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傳達給我。這樣循環地

輪流着，不是都很有益嗎。正好像單行道上，不會有進步的交通管制，一經交流，就非改進不可了」。

小亨利雖然時刻地爲他的手下員工着想，盡力設法去滿足他們的願望，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中層人員往往不能盡如理想。記得有一次翻鑄工場裏有一個領班生病請假。當然，他的工資是停付了。但病後他申請得到了醫藥協助金。有一個監工員譏諷他是詐病，因此引起齟齬。其後在領班代表會中就有人提議要增加條文，以免再有這種事件發生。小亨利當即回答他們說：「專靠條文不能安定勞工，等於專靠法律不能和洽人民一樣。我們必要更進一步來增加人與人間的瞭解，我們要在這一點上用功夫。單單在字句上的增刪，有什麼意義呢」。

小亨利在對付人這一層，似乎很有點辦法。底特律利（福特總公司所在地）有一位老人家說：「小亨利似乎知道他自己是太年輕同時和不够能幹來做這樣大公司的主持人，所以他總是很樂意地去接受別人的意見。在底特律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不願意幫助他的」。這就是小福特在人品上獨到之處。他把他自己所有的謙下、機警和爽郎等長處集合起來去對付人，使得人人都樂意爲他所利用。

福特公司的各個行政機構，都有內部傳訊的設備，即使彼此相距很遠的辦公室，仍能隨時隨地相互交談。小福特每逢和他的職員討論一個問題而不能馬上得到結論時，他總是向對方說：「等一等我自已前來和你再談」。他從來不說：「等一等你上來和我再談」。單在這一點上說，那

就够迷人的了。

當小福特在一九四三年加入福特公司工作的時候，他的祖父已經是八十歲的老人了。那時公司的大權，是操在哈來白乃脫（Harry Bennett）的手中。我們知道，福特公司向來是個人獨裁。所以一旦老亨利受到了白乃脫的包圍，其他各部的主管便惶惶然若無所主。小福特第一個看到他的老祖父是被孤立了。他想盡方法去彌補這個缺憾，但每次他都覺着孤掌難鳴。每逢他試想有一點作爲，就好像有人在拖他脚下所踏的地氈一般，往往欲前反却。拖力來自何處，不可得知。他簡直是如同和魔鬼搏鬥一般，摸不着對方的來踪去跡。他眼見在白氏管轄之下員工們工作道德之日落及整個管理部門之混亂、糜爛及逐步官僚化。他內心的信念，於是更加堅強，而決定咬緊牙關來挽回這個局面。

他很幸運地得到了約翰日格斯（John Bugas 工業界中居董事長地位的一個人物）和米特白力格（Mead L. Bricker 有名的增加生產的好手）兩個人的同情。他更得到他母親不少的鼓勵，她是親身目視白氏當年如何磨折她的丈夫（小福特的父親）致死的人。此外，他又請回了九年前任總公司推銷部經理約翰台維斯（John Davis）。台維斯因爲得罪了白氏，所以被貶到西部分公司。小亨利親自到西部去找他，但台維斯不願重臨舊地，因爲白氏如果再對他開火，這一次他恐怕吃不消。然而小亨利都異常堅決，屢次懇談，最後並以同進退爲息壤。台維斯爲他的誠意所感，結果，答應了。

一九四四年台維斯的歸來，就是等於向白氏

的直接挑戰。小亨利那時雖然擁有了台維斯，白格斯和白力格三員大將，但是在公司之內商量機要，還是不大放心。於是他們就約定在古老的底特律俱樂部來作爲他們解決大計的大本營。

在這樣集中智慧，縝密安排，小心應付，沈潛忍耐之下，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的那天，董事會方始正式宣佈小亨利爲福特公司的總經理。會議未終，這位年輕的新任總經理離開了會場，穿過紅木的走廊，走入白氏的辦公室。短短的幾分鐘之後，當他再從白氏室內走出來之時，白乃脫已不再是福特公司的主管了。

改革的行動，於是立刻開始。其作風之爽颯，恍若秋風之掃落葉。這秋風，把許多人由辦公椅上吹下一直刮起而把他們委棄在外邊。一個月之內，改革工作大部完成。在外面人看起來，這真是一種奇蹟。

在改革的頭一天，整個福特公司是沈默了。各部門的主管人簡直沒有一個在外間露面。無論是在市政委員會、鄉村俱樂部，或是各種體育會中，都見不到一個福特公司較爲上級的人員。報館訪員想探聽一點消息，用盡方法，都摸不着頭緒。

過了一夜之後，福特公司的人，方始漸漸在公衆集會地方出現。報館訪員要探訪消息，便照常由公司的新聞處充分供給。要打電話去問內部的人員，也不如昨天那樣的老是找不到了。

於是他開始週遊各地。凡是福特分支公司所在的地方，他都盡力設法去聯絡一切，並很熱誠地接受批評。對於經常供給公司六千種零件的製造廠主管人，他更是加意週旋。一聽發言，感謝

他們歷年以來貢獻給公司的偉大力量，然後他再很虛心地向他們請教，如何可以減輕成本。小福特贏得了他們大夥兒的心情，於是每年又可減去了幾百萬元的成本。

當然小亨利的程途是遙遠的。到今爲止，還只是實行了愛摩羅柏所述四項願望中的第一項。其餘三項，固然，小亨利也開始了。但是，規模如此宏大，分支機構又遍佈全球，上下員工亦達十三萬人之多的一個公司，需要一點較長的時間來完成它的計畫，這是無可非議的。

惠尼大學 (Wayne University) 勞働問題教授柯士民 (Edward Cushman) 說，小福特這一措施，可能遇到兩重困難。第一是白乃脫所種下惡因的灰復燃，第二是本州的 UAW (United Auto Workers) 恐怕不易對付，單是在本州的福特機構就有六百個，員工共達六萬二千人。

並且，因爲機器的繁多，內部文字的往還，往往流於呆滯精延而染上了官僚式的腐敗性。小亨利有見於此，已漸漸的把中央集權，逐次改爲地方分權，使得各個主管都有機會代他分負責任而發展理事的天才。

柯士民又指出小亨利也自有其成功的條件。因爲他本人深切瞭解於對付工會之困難而他的熱誠、忠實和堅毅，往往亦足以贏得對方的好感。並且，公司內部還有老福特傳下來一種富於韌性的特點，這點，在已往曾經幫助過老福特解決了不少的困難，這就是公司中既無有龐大組織的董事會又沒有盈千累萬有選舉權的股東干預的用人行政，於是小福特就能磨礱一舖路徑已走。

對於這個「新型」福特公司稍爲熟悉一點的觀察家都相信設使小亨利的政策能够成功，他可能把整個美國工業或者並可以說把整個美國國家領上了一條簇新的大路，使得經濟制度能够和我們已有的政治制度一樣，一起民主化。

當然，他們並不是如此簡單說是小福特一定可以成功，但是，他們却實在說，他是很有成功的機會。譯自 Reader's Digest 一九四八年二月號 原名：Revolution on the River Range.

## 編後

目前土地改革問題引起一般人士的注意。我們懂得一般人注意這個問題的苦痛，國共之事已經到了白熱化的階段；在軍事方面，共方的活動已經蔓延到全國每一個角落。其所以致此之由，一般憂時之士，認爲共黨的分田政策，頗有功勞，因爲全國各鄉村地主少，窮人多，平時窮人受地主的壓榨，而無可如何，現在共黨實行分田政策，打倒地主，扶植貧農，當然會受一般貧農的歡迎。所以共黨到處裏從極多，不必花費好多的兵力，而可以到處生根。因此共黨的力量，可以日長夜大，蔓延極速。反觀政府方面，政府口頭上不離三民主義，而實際上，政府所行所爲，與三民主義不相干。共黨的分田政策，是從民生主義裏土地政策剝竊而來的，而政府棄而不用，連最溫和的土地法定的規定，以及綏靖區土地處理辦法，都不能執行。反被共黨利用來打倒國民政府；這是甚可惋惜的事情。所以一般有心人痛感要打倒共黨，非徹底執行平均地權的政策，以爭取廣大民衆不可。

所以現階段的土地改革問題，已不是單純的土地改革問題，而是國共兩黨爭取民衆的政法問題。我們也覺得這個問題所關兩黨前途，所關國計民生甚大，願意在大家熱烈討論土地問題之際，出曹王兩先生的文章。當然曹王兩先生的意見，是代表他兩位先生自己的。



# 亞 洲 銀 行

專 營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總 行

上海寧波路八十九號 電話一七五〇〇轉各接部  
(電報掛號二四二)

本 埠 分 行

森林路中(霞飛路)二四七號 電話三八四七  
中正路中(福煦路)〇〇六號 電話三九二七

外 埠 分 行

蘇州分行：蘇州正中路〇九號 電話一四四一  
無錫分行：無錫布行街一六號 電話二四四一

## 資 本 市 場

(原名「證券市場」)

第一卷第一期

利用證券市場誘導	吳大業
證券之入於生產	吳大業
證券之吸收資金的各種理論	錢榮堃
物價繼續經濟的分析和	方錦
政策	方錦
財務報告分析之理論與	吳承明
方法(上)	吳承明
外情介紹	時論彙輯
參考資料	統計資料

上海證券交易所

調查研究處編印

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會員銀行

## 松 江 典 業 銀 行

經 營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松 行 上海漢口路六三六號 電話七〇  
滬 行 松江西門大街 電話七〇  
電 話 九四九四七九三五三三 九六一八五



上海市錢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 敦裕錢莊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手續簡捷 服務週到

地址 上海九江路二二四號  
電話 一五五六六總機

代理上海市庫收付  
扶植上海市工商業

# 上海市銀行

經辦銀行各種業務

手續簡便利息從優

總行行址 九江路十五號  
電話 一五〇三四

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會員

# 福昌銀號

創設於民國二十年

財政部註冊給照

歷史悠久

信用著卓

地址 上海山東路四十五號  
電話 八八一五  
八七二五  
八三

經營法定商業銀行業務兼營儲蓄業務

★以服務社會為宗旨★使顧客滿意為原則★

上海市房地產商業同業公會會員

# 大業地產有限公司

經營  
房地產之經租及管理  
房地產之投資及買賣  
房地產之建築及設計  
其他有關房地產業務

服務忠實 管理密嚴

地址 上海四川中路三四六號  
電話 經理室 一七〇一八  
營業室 一六二七二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五五七號  
中華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七二號  
上海差政管理

每星期一特等廣告價目  
一等一千元  
二等六百元  
三等四百萬元

本埠航空附郵資二萬一千元  
外埠航空附郵資二萬一千元

紀念券  
98  
上海證券

# 大昌正證券號

代客買賣證券

手續簡捷服務週到

地址 四川中路四〇三號  
電話 一五五一六

紀念券  
77  
上海證券

# 永亨證券號

代客買賣證券

手續簡捷服務週到

地址：四川中路五〇五號  
電話：一五七二〇——一五七二六